

明慧期刊
MINGHUI

天地 蒼生

破坏传统

一百年来
中共将传统文化
破坏殆尽



2020年1月

特刊

www.minghui.org



揭露中共罪行

破坏传统

卷首心语

1 在毁灭的边缘救赎

视角

2 记忆

陨落的星辰

3 传统文化的守夜人——陈寅恪
6 为传统汉字殒命的悲壮文人——陈梦家

历史档案

8 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是怎么断的？
——从延安整风到“思想改造”运动
11 钢琴家眼中的“大右派”父亲
14 文革首位被打死的女校长
16 消灭思想先驱的“一打三反”
18 “破四旧”往事

思痛录

20 留在大陆的中华民国院士之大结局
22 被中共打造的“革命母亲”杨沫

万变不离其邪

24 共产主义“炼狱”中的“宗教自由”

走进真相

26 二十一世纪古拉格——黑监狱里的洗脑术
30 “四·二五”万人大上访纪实

毁人不倦

32 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35 “秘史”死灰复燃 难掩历史真相
37 回答钱学森之问

复兴传统

38 神韵 复兴中华传统 引领普世价值

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遗产的东方国度，为什么历经几度外族入侵而没有亡国灭种？概因蒙元、满清等外夷占据中土后，不是急于去消灭中华文化，而是在叹服于她的精深、璀璨的同时，主动膜拜、同化、融合于她，终使其更加恢弘博大。

文化，是一国一族的立命之本。欲消灭一个民族，唯消灭其固有的文化，才能做到；当一个民族的语言、书籍、思想、文人、艺术品不复存在，她便被抽去了灵魂，虽存而犹亡。

中国传统文化，从三皇五帝到儒、释、道，交相辉映，贯穿中华五千年，是以天人合一、敬天信神、重德行善、“因果轮报”为究竟的神传文化。她滋养华夏中国，成为协和万国的礼仪之邦；她教化中华儿女，成为具有优雅、坚毅、深邃、超然之气质内涵的优秀族群。

然而，百年来，中共有计划地、一步步完成了摧毁传统文化、将党文化植入民族肌体的系统工程。其完整的路线图清晰可辨：

中共脱胎于苏联“十月革命”，鼓吹暴力与屠杀，引入西来“幽灵”，摒弃中华道统。

取缔传统宗教，用中共这个假神和共产邪教教义，取代中国人心中信仰的正神、天道。

改造知识分子，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打掉文化精英所秉持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作为传统文化承载者的“士”阶层整体消失，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为道统负责的独立力量了。

文革“破四旧”，毁坏了无数文物古迹；“现代化”“旧城改造”，拆毁了一片片古城街区。积淀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物质载体，只剩下零星碎片。

“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人性、人道遭到反复、无情地批判，无异于对传统文化的精髓釜底抽薪。

蕴含丰富内涵的正体汉字被粗暴“简化”；传承古文化的文史哲专业被马列斗争学说“主旋

律”所覆盖；古文、古诗词从教科书中大幅删减；一部辉煌的文明史被歪曲成阶级斗争史或阴暗的宫廷内斗。

至此，中国人与祖宗、先贤的联系被割断，文化底蕴消失，悠悠古风不再，成了无根的飘萍，在无知和粗鄙中坠落。

接着，中共从未停止把党文化灌输进中国人的头脑。新闻、影视、出版物、会议、标幅、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铺天盖地，让你无时无刻不浸泡在党的理论、观点和资讯中。

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政治教育的洗脑追随你一生。

打造伪“艺术精品”；包装“英雄模范”假典型。让你在感动中，潜移默化地把“跟党走”当作“正能量”，模仿党喜欢的人格。

最后，把“利与欲”当成国教，腐败治国，使中国人在贪婪放纵和相互倾轧中，耗尽仅存的一点良知。

如今，许多中国人不知普世价值为何物，分不清是非善恶，把拥抱冷酷变态的党性、战狼式的仇恨和斗争、宣泄狂妄自大的民族主义当作时髦，不计后果地与世界为敌。

礼仪之邦已变为十恶毒世，人心糜烂暴虐，寡廉鲜耻，善恶颠倒，社会溃败，国已不国，应验了“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的民谚。

中共的目的几乎已得逞：从毁灭中华文化，来毁灭中华民族。本是西来幽灵、以毁灭人为本性的中共，垂涎中华民族由来已久。

幸而，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基因是中共动不了的，上天在造就她的当初就埋下了度过灾难的种子，当中国人身处毁灭的边缘时，心底仍珍藏着那一份善良。拒绝中共的灌输，摆脱邪灵的控制，回归传统文化，重建对神的信仰和道德——上天已铺好了救赎之路，就等着每个中国人做出对的选择。





北京宣武区包头章胡同著名的“转弯抹角”，毁于2007年宣武区大古片拆迁改造。

古城劫

自1980年代起，在利欲的驱动下，官商勾结，全国到处上演着大拆大建、假古迹代替真古迹的“旧城改造”闹剧。城市灵魂、城市文化的根毁了。

北京——古老的胡同、四合院渐渐远去

京城民居的最大特色四合院大举消灭，近百万居民被迫告别故居。老北京风貌和京味儿渐渐远去。

西安——“天然历史博物馆”面目皆非

古时的长安，两三百年以上的老宅院占了半数以上。1990年代初起已被大面积拆除，32处明清民居中的27处被夷为平地，建筑构件和文物遭到哄抢。

曲阜——孔子的故乡文物尽毁

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文革期间，孔府、孔庙、孔林遭严重毁坏。1978年政府拆掉城墙，2003年又“复建”假城墙。

南京秦淮河沿岸——六朝古都濒临灭绝

自东吴定都始，一千多年来居民沿河聚居，形成了繁华的老城区。经1980—1990年几轮拆迁、2006年的改造，沿岸的明清街区面临灭绝。

毁灭还在全国各地发生着……在中国现有的119个历史文化名城中，20个已经没有历史文化街区了；30个古城的“重建”项目，投资从数亿元到上百亿元不等。

作家梁实秋、张爱玲慧眼看透中共

民国时，梁实秋在《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中说：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

第二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

第三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

而另一位作家张爱玲，1949年后，抱着观望的态度留在了上海。

1950年7—8月间，她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看到了“贫穷落后”、“过火斗争”，她做不来“写英雄”、“歌颂土改”，也不打算尝试，感到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加之周围不断有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便萌生去意。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去了香港，后前往美国。



张爱玲

传统文化的守夜人——陈寅恪

作者 陈奎德 林辉 大纪元 / 编辑 希金

他，以遗世独立的风骨，一人之力与极权政治系统对峙，成为传统文化最后的守护者。

“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生于光绪16年，祖籍江西义宁。祖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清末维新派著名人士，曾国藩以“海内奇士”视之。

父亲陈三立，著名诗人，清末“四大公子”之一。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85岁的他绝食抗议，5天后忧愤死去。

陈寅恪在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子集。13岁远赴日本留学，20年间游历东西方，美国哈佛等世界名校都留下他的足迹。他博览群书，精研欧美人文学术，但不以文凭为目的。回国时虽一张文凭都没有，却通晓二十几种文字，能够用十几种文字撰写论文，并懂得许多已失传的古老语言。

1925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清华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教授。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推荐陈寅恪时，校长疑虑，他没有文凭，又没有大部头著作，怎么能当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说：“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我的著作加起来，也没有陈先生的300字有价值。”

时任清华国学院筹备主任吴宓说，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的人”。此时陈只有36岁。

他讲课时，许多著名教授如梁启超、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都来旁听，所以后人赞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平时很傲，却公开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



陈寅恪

陈寅恪学养精深，学贯东西。他国学功底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与吕思勉、钱穆、陈垣并称“中国四大史学家”。他治学面广，在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堪称泰斗。

苏联学者曾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厥碑文，但无人能看懂。陈寅恪以突厥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异口同声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都难以解决，又是他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傅斯年这样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胡适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盛名之下，陈寅恪诚实而不伪饰，谦和而自信，他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气节和操守

陈寅恪的盛年是在遭逢战乱、颠沛流离中度过的。

1937 年北平沦陷，他正患眼疾，为避免被日寇汉奸胁迫利用，决定不做手术，冒着失明的危险出走，暂居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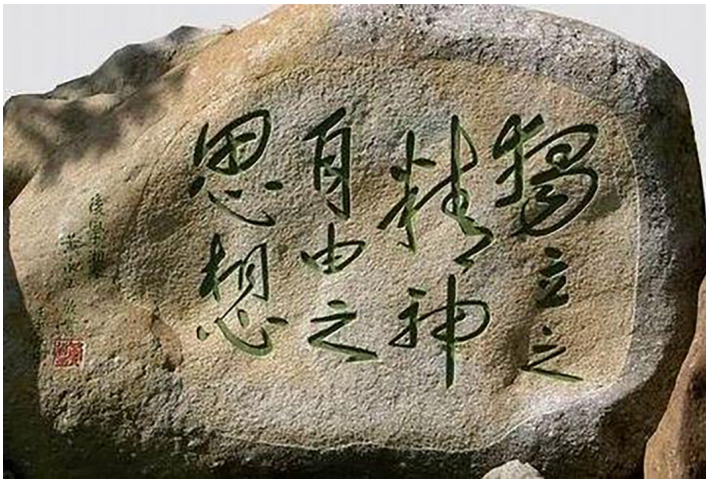
1941 年 12 月，日军占领香港，他立即辞职。一家人贫病交加，日本人持重金委任他筹办东方文学院，被他断然拒绝。日军又送去重礼，欲以高薪聘请他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他不为所动。1942 年春，日方再度请他到占领区上海授课，他再次拒绝。

最终，陈寅恪携妻女逃离香港，辗转来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途中，他的私人藏书和手稿遗失甚多，右眼已经失明。

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有一天，空袭警报响了，大家慌忙逃跑。刘文典跑着跑着，忽然想起还有视力差的陈教授，忙带着几个学生跑回来，搀着陈寅恪往外跑，刘一边跑一边大声说：“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抗战期间，陈寅恪坚持治学，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巨著。《剑桥中国史》赞道：“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返回清华园。



王国维墓志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不降志，不辱身，守护传统文化

陈寅恪曾为国学大师王国维写下墓志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他自己一生都在实践这一理念。

1948 年底，中共军队逼进北平，傅斯年一天三个电话催请陈寅恪去台湾，陈已举家乘飞机到达南京，但最后还是选择留在了广州岭南大学。他说这把年纪了，不想离开熟悉的故土。

但仅仅一年后，他就后悔了，大有“痛悔误上贼船，佳期自误”（陈寅恪语）之感。中共对知识分子发动了“思想改造运动”，那时他几乎双目失明，政治活动一般都不参加，但他无法认同中共政治对学术自由的践踏。

1952 年院系调整，陈寅恪遂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在此度过了他最后的二十年。

1953 年，中共控制的中国科学院设立历史研究所。郭沫若任上古史所长，范文澜任近代史所长，拟聘请陈寅恪担任中古史所长。为此，特派陈的学生汪篪前去游说。

汪篪原是陈喜爱的学生，中共篡政后任教于北大，接受了思想改造，成为中共的追随者。

汪篪身揣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亲笔邀请信赴广州。他自恃有“尚方宝剑”，居然以党员“教育开导的口吻”，与先生严肃谈话。这让陈寅恪勃然大怒，指着汪篪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几天后，念及当年师生情分，陈最终答应与汪做一次长谈。

谈话中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师生的缘份已尽。

第二天一早，由陈寅恪口述，夫人唐筼执笔，写了回信《对科学院的答复》。信中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的惊人之句，提出担任中古史所长的两项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信由汪篪带回北京。有学生劝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助手黄萱问先生：“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他答道：“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已集体臣服于中共意识形态，用毛泽东得意的话说，几乎都“夹起尾巴做人”了，唯有陈寅恪的胆识和风骨惊为天人！

去北京赴任之事不了了之。但到 1958 年，中山大学批判陈寅恪是“假权威”、“伪科学”，是“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他愤怒了，表示今后不再开课，马上退休。

从此，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浪潮中，他独守清静，闭门著书，誓不与之同流合污。正如老朋友吴宓在日记里形容他的“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

晚年，陈寅恪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着惊人的记忆和毅力完成了两本巨著：《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形成了以诗与小说证史的独特治史方法。一时轰动海外。

他以遗世独立的风骨，一人与极权政治系统对峙，成为留在大陆的传统文化的守夜人。

“思想不自由，勿宁死”

1966 年文革来临，中山大学掀起批判陈寅恪的狂潮，助手黄萱被赶走，护士们被撤走，只剩下夫人唐筼与他相依为命，连女儿们也怕受到牵连，不敢来看望；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大字报甚至糊到他家里、衣柜、床头和他的衣服上。

家被抄了一回又一回，夫人受到多次毒打，财物尽失。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他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 20 余封祖父往来手札、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被劫走。

为了验证“陈寅恪有惊人记忆力”的说法，

造反派将他拖下病床，强迫其背诵毛语录，倘若不肯背诵或有一句背错，便遭到辱骂和毒打。

造反派还在陈家四周挂上高音喇叭。双目失明，且患严重失眠症和心脏病的他，突闻耳边“革命群众”整日的“愤怒声讨”，抱头在床上打起滚来。

造反派见状干脆将喇叭绑到陈氏的床头上播放。陈氏夫妇当即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然而，当时中山大学一份“形势报告”上说：陈寅恪“死不悔改”。

1969 年初，他被勒令搬出已经住了 16 年的家，迁至西南区 50 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此时，他已衰弱得不能进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见他一语不发，眼角不断有泪流出。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相爱至深的陈氏夫妇常常相对而泣。1969 年 5 月 5 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逼作口头交代。他留下“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一句，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10 月 7 日晨，心力衰竭的陈寅恪溘然长逝，享年 79 岁。

贤妻唐筼自行停药数天，45 天之后，亦追随丈夫而去。在台湾的蒋介石闻讯后，水杯都摔掉了，流着泪说：惨无人道！

1980 年，由其弟子整理的《陈寅恪文集》问世，这套文集是按照先生生前的托付，以繁体字、竖排出版的。



双目失明的陈寅恪

为传统汉字殒命的悲壮文人——陈梦家

作者 叶蓁 大纪元 / 编辑 希金

他曾是乱世才子，浪漫诗人，后又成为古文字、考古学大师。因文字成名的他，却因文字获罪，与他守护的传统汉字，一同亡于中共当权者之手。



陈梦家

长衫落拓美少年

陈梦家 1911 年出生于一个神学家庭，在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宗教氛围中度过童年，对中国诗歌有浓厚兴趣。1927 年陈梦家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的法律系，在校期间成为“新月诗派”的一员主将。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陈梦家《摇船夜歌》）诗界评价他的诗“好如一片秋空，具有着静闲的悠然的美”。

1931 年，陈梦家年方弱冠，便出版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同年 7 月应徐志摩之邀，编选新月派代表作《新月诗选》。钱穆说他“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

然而，因为对中国上古神秘文化抱有极大的好奇心，他在燕京大学转攻古文字学研究生，把所有精力投注于古文字学和古史学方面，仅 1936 年便发表了 7 篇论文。

在燕大读书时，他与才女校花赵萝蕤相识

并结婚。“七七事变”爆发后，这对璧人被迫迁离北京，辗转于长沙、香港、昆明等地，在西南联大暂时栖身，1944 年赴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国古文学。

一身诗意付金石

执教期间，他致力于收集、汇整流散于美国的中国古代铜器，几乎遍访美国所有藏有铜器的人家、博物馆乃至古董商铺。以惊人的学力，编纂殷周铜器集录，为研究中国铜器留下宝贵材料。

1947 年，陈梦家怀着报国理想回国，在清华中文系执教。可是没过几年，中共建政，最黑暗的时期到来了。

1951 年，中共发动“思想改造运动”，学校停课，知识分子人人过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陈梦家因浪漫派诗风和出国背景，难逃厄运。

他多次在学校大会上作检讨，表示愿与过去“一刀两断”，接受“新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然而，他私下里无法理解这种运动。一天，校园的大喇叭里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他听后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注：《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预言极权社会的情景。）

1952 年院系调整，他被分配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最初几年，生活相对平静，他学术建树颇丰，先后完成《殷墟卜辞综述》等多本专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古文字、考古学大师。他用丰厚的稿费购置了一套四合院，每天在家工作超过 10 小时。还热衷于收藏明清家具。

不知言路成绝路

1956–1957 年，中共鼓励“大鸣大放”，制

造政治变暖气氛。陈梦家天真地以为中共真心纳谏，便将多年不敢提的意见真诚吐露。

中共从成立之初就逐步毁灭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统汉字。1949 年后，正式着手汉字简化工作，决定使用简化汉字作为过渡，逐渐实现字母化。作为用汉字写作并探寻古文字脉络的文人，陈梦家深知，汉字如果被废除，将真正成为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的障碍，中华文化的传承也随之被切断。

1957 年 2 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略论文字学》，批评汉字简化方案。3 月起，他参加文字改革座谈会，表达相同看法。

5 月 17 日，陈梦家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慎重一点“改革”汉字》。他却不知道，就在两天前，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发出打击右派的信号。他的言论正好成为批判的靶子。

他被划为右派，学术活动完全停止，遭到“降薪停职使用”，更要忍受社会上一众学者的联合批判。参加不完的批斗会、做不完的自我检讨，他变得情绪低落，身形消瘦。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执教的赵萝蕤，因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精神压力，患上精神分裂症。1958 年 12 月，陈梦家又被下放到河南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直到 1960 年，他才重新回考古所，受副所长、朋友夏鼐照顾，调往兰州整理汉简。在那里，他以超乎寻常的才华完成《武威汉简》、《汉简缀述》两书。两年后，他回到考古所，遂一心扑在考古研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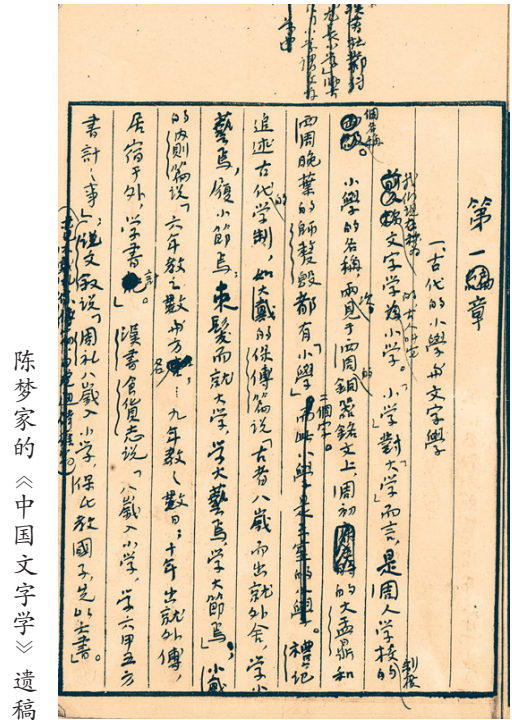
两度求死浩劫中

文革的爆发，堵死了他最后一条路。

陈梦家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重新被揪出批斗。考古所成立了监督小组，每天强制他上午劳动，下午写检查。烈日当头，他被强迫长时间跪在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吐口水。

他的四合院被红卫兵查抄，家中藏书一扫而空，住所被他人占用，他和妻子只能住进一间车库改造的破屋。

1966 年 8 月 23 日，红卫兵闯入考古所揪斗



陈梦家的《中国文字学》遗稿

他。24 日给他戴上“流氓诗人”的纸帽继续批斗。陈梦家捱过了一天的批斗，来到一位朋友家。屈辱与绝望带来的悲愤之情一瞬间爆发，他放声呐喊：“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谁知他被考古所的“造反派”一路跟踪。就在朋友家中，他被强行下跪，遭受又一轮辱骂和毒打。最后被押回考古所。

24 日当晚，考古所附近的东厂胡同，至少有 6 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人回忆，“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被关在单位的陈梦家应该也听到了。那一晚，他悄悄写下遗书，吞下大量安眠药。

他被送往医院抢救过来。第二天他的家里贴满了大字报，前去探望的弟弟被红卫兵拦住毒打一顿。陈梦家很快被从医院轰出来。9 月 2 日，他趁众人不备，自缢身亡。三天后，考古所召开“声讨陈梦家畏罪自杀大会”，为这位终年 55 岁的饱学之士“送行”。

陈梦家在《铁马的歌》中诗云：“没有忧愁，也没有欢欣；我总是古旧，总是清新。……也许有天上帝叫我静，我飞上云边，变一颗星。”

他本与政治无涉，却三次被中共整肃，直至殒命，变成一颗寒夜的孤星，无声地注视着中国大地上中共如何使文化衰败，大师消亡。🇨🇳

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 是怎么断的？

——从延安整风到“思想改造”运动

作者 丁抒 唐文 大纪元 / 编辑 希金

作为传统文化承载者的“士”阶层，在中国是怎样消失的？

今天的大陆知识分子为什么难有担当？

这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

初次尝到恐怖和战栗的滋味

1937 ~ 1938 年，成千上万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青年，相信了中共“北上抗日”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许诺，怀抱着自由、民主的理想，经过艰难曲折来到延安。但是，现实使他们很快感到了失望。

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为代表。他在文章中批评了中共的等级制度，及毛泽东的专制思想，并把尖锐的观点贴到墙报上。看墙报的人川流不息。中央研究院调查发现，对王实味“或多或少表示同情的占 95%”。



王实味和他的《野百合花》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王实味的墙报，回来后说，这些东西“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于是，整风运动的对象从党内高层转向大批知识分子，又同阶级斗争、肃反联系起来，演变成一场大清洗。毛泽东认为，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敌人”，康生声称“延安的知识分子最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

知识分子被要求参加一场场批判斗争会。为逼迫人们承认自己是“特务”，酷刑多达 24 种。许多人精神失常。许多人不堪其辱，选择了自杀。不少特务嫌疑者被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

“逼、供、信”之下，一时间延安特务多如牛毛。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被打成“特务”的占 70%。行政学院除了一人外，教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有一半也是“特务”。抗日军政大学排以上的干部 57% 是“特务”。中央党校第三部集中了延安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最后整体被打入另册。

然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侍从室情报组长唐纵在 1942 年 8 月 23 日的日记写道：“现在延安的情况很混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

王实味被宣布为托派分子、兼职特务，逮捕入狱。1947 年中共撤离延安时，他被带到黄河边一处偏僻山隅处决：大砍刀从身后乱刀百次，尸体丢弃于一口枯井中。

延安的知识分子们尝到了恐怖和战栗的滋味。1944 年 6 月，有记者访问延安时观察到：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人们脱胎换骨了，“以

同一的问题，问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说违心的假话、为中共唱赞歌渐渐成为风气。

党文化的源头

1942 年 5 月 2 日，中共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有 100 余人参加。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作者高华将它概括成五层意思：1、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文艺的各种形式要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2、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3、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不允许描写阶级斗争以外的任何非阶级意识的表现；4、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5、反对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

座谈会上胡风提出不同看法：文艺除了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还应讲究文化传统。但他的观点不可能被中共接受。毛泽东的报告，对什么是中共党文化、如何贯穿和体现党文化，表达得淋漓尽致。“为工农大众服务”只是幌子，中共要把党的绝对权力贯彻到所有领域，任何可能会抵消这个权威的东西，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必欲摧毁之。

实际上，中共害怕知识分子代表的正统文化和道德，但又需要利用知识分子在夺权后帮助自己给普罗大众洗脑，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识分子，把他们改造成这样的机器：绝对信奉和服从党的意志；主动歌颂党的“伟光正”，不敢揭露黑暗；自由、民主、个性独立全部灭绝。

“思想改造”重演延安整风

于是，中共刚一窃政，就迫不及待对知识分子开始了一波波改造：揪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反党小集团”，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梁漱溟逐一批判……大的运动有 1950 年代的“思想改造”、“反右”直至“文革”。

1951 年 9 月 29 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



1951 年，毛泽东亲自提笔批判《武训传》，拉开了中共建政后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

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思想改造”运动拉开帷幕。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了大量非体制内知名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如：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张东荪、沈从文、钱端升等，都接受了记者采访，表态与过去划清界线。

延安整风那一套被拿到全国重演一遍：强制学习、坦白交代历史、自我检讨、批斗、集中过关。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从大、中、小学校教员起，连高中生都不放过。

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清华大学的批斗对象。他早年投身民主运动，多年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其历史人所周知，却被追查在表面思想背后有“思想暗流”，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越检讨，越说不清，被批斗得痛哭流涕。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 1952 年 9 月 12 日的日记中写道：“予失眠自作检讨书起，至今亦月余矣……至近日而非服药两三次不可，‘脑息定’至不生作用。”

学者周鲸文描述到：“大会批斗是严厉的，其

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斗地主，在镇反中镇压反革命。”台下的同事、学生“指着鼻子骂你”，不仅尊师重道的传统丧失殆尽，个人的尊严也荡然无存。

与其它政治运动相结合

更令人恐怖的是，中共还有意将“思想改造”与朝鲜战争、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重叠。如果一个人被定性为政治问题，就面临不可抵抗的暴力镇压，有可能被逮捕或劳改。

被列为世界 88 位数学伟人之一的华罗庚，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不久便碰上了“思想改造”。他尽其所有地交代，最后因为还保留着原有的出国护照未加焚毁，遭到无休止的批判，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留后路”的打算。

他有口难辩，绝望中选择了自杀。因被发现得早，得以保住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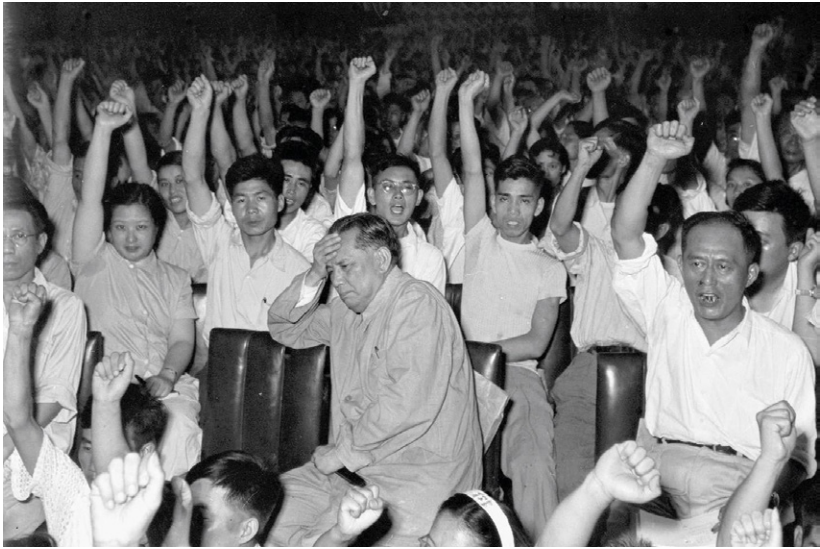
“士”阶层整体消失

一场场血腥运动让知识分子目睹了共产党的凶残，许多人的脊梁骨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

据当年清华大学学生回忆：“教师讲课时突然谨小慎微起来了，尽可能照本宣科，闭口免谈自己的独特见解，随之在晚饭后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散步和学生随便攀谈……这些先生们自著或编译的教材全部作废，通通改用苏联教材和教学大纲。”

胡适看了金岳霖在运动中写的检查后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地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们应该体谅，他们所坦白的，绝不是他们心中要说的。”

学者刘再复分析，自我贬抑和自我矮化，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逐步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本性和独立思考能力，顺理成章地变成专制政权的驯服臣民，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也就不再有成果问世。有的人改了行，如北大的沈从文改行搞文物。大多数人奉行“沉默是金”。



“大右派”章伯钧批斗大会现场

美学教授朱光潜自述：“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写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没有读一部像样的美学书籍，或是就美学里某个问题认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我不愿，而是由于我不敢。”

金岳霖的学生说：“金先生高水平的哲学著作，都是他在三四十年代写的。”沈从文说：“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赵树理自我解嘲：“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

学者谢泳表示，一个阶层在社会上的独特地位消失了，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

只要鸟儿在笼子里唱颂歌

1951 年 11 月，“思想改造”又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将党文化推向全国。

1956 年毛泽东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但是到 1957 年 6 月，更大规模的清洗——反右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酷烈程度卷土重来。其实，中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要鸟儿在笼子里多唱颂歌，决不许鸟儿钻出笼子的。几十年来，这一红色雾霾一直笼罩着中国大陆，造成几代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沦为“犬儒”、“精致的利己者”，只会为中共站台、背书，独立敢言者成为稀有之物。



钢琴家眼中的“大右派”父亲

佚名 大纪元 / 编辑 甄言

1982 年 6 月的某天，储望华离开北京赴澳洲留学，临行之际，中央音乐学院校办主任急匆匆跑来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没想到在即将离开故土的这一刻，储望华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 年的父亲告别。

前言

现年 77 岁、定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是“大右派”储安平最小的儿子。这位儒雅的白发学者是著名钢琴协奏曲《黄河》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改编的很多钢琴作品不仅被国内钢琴家大量演奏，而且成为音乐院校常用教材和曲目。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 月 8 日到 15 日，中共统战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要求知识分子们大鸣大放。

为了响应中共的号召，党外人士章伯钧、罗隆基分别发表言论，针砭党弊。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公开直指中共“党天下”。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

为什么？》，发出了打击右派的信号。紧接着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被称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右派”。到 1958 年反右运动结束时，全国有 55 万人被划分为右派分子，几百万人受到牵连，连左派学者马寅初、费孝通都未能幸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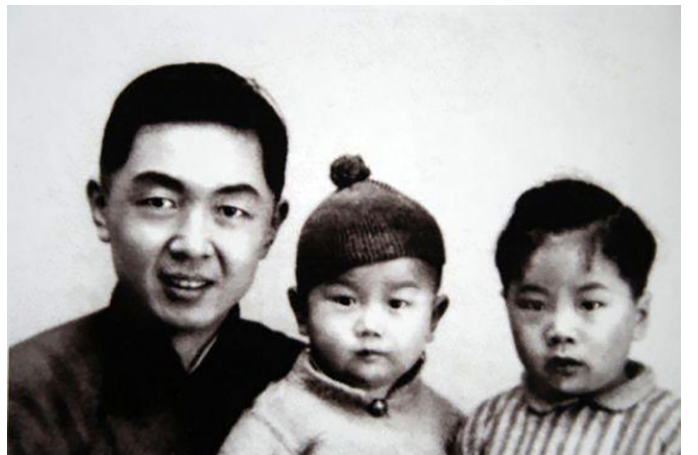
反右运动中的所谓“极右分子”，有的被枪毙，更多的人自杀。在北京的颐和园附近，早起散步的人们，经常看到树上吊着死人，很多人跳湖自杀。“右派”分子家人被当作政治贱民受尽凌辱，遭受着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

储安平于 1958 年 1 月被划为“右派”，1966 年 9 月失踪。在储望华的回忆中，关于父亲的影像是支离破碎的，可是那段父子情深历史却永远无法忘怀。

以下是储望华关于父亲的回忆（因篇幅有限，有删改）。



储望华



储安平和他的两个孩子



失踪

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的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

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 1966 年 6 月 3 日。

那之前两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父亲肯定在被“扫荡”之列。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紧紧握着父亲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没料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的诀别。

几个月后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姓女士的电话，问我父亲是否到我这里来了。我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

父亲失踪了。

此前，父亲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批斗，就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比较浅，父亲被人捞上来了。那一天是 8 月 31 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

“未遂”之后，父亲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造反派看管起来。

9 月 20 日，我得知中央统战部下达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在 10 月 1 日国庆节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

到了 1968 年，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储安

平专案组”，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专案组怎么会连父亲的照片都找不到？过了很久，我才悟出此举实为试探，试探我是否与父亲“划清界限”。

数十年来，我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后枕边的泪痕……

十年

1957 年 4 月 1 日，父亲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钧邀请，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父亲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还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更亲自打电话，请父亲到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去发言。

6 月 1 日，父亲发言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父亲是属于比较清醒理性有远见的人。他是没有陷于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是他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

他还说：“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

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6 月 8 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

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父亲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此后，他到了商务印书馆，主要

任务是校译别人翻译好的英文稿——虽然父亲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译，但是他也只能是“校译”，而且不能署名。

“政协”在石景山模式口有个劳动改造的农场，父亲有时会被派到那里劳动，放羊、种菜，后来还做过“蘑菇培植”。

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那里看他，见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里只有一个简单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里充满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说：“这种地方怎么能睡？”

自从“反右”以后，父亲虽然写过检查、被劳动改造，但他在本质上并不以为自己错了。

1949 年，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抱有一颗赤诚之心。

1946 年他创办了《观察》杂志，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也确立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观察》一直以尖锐而辛辣的风格，批判社会现状，深受大众和知识界的欢迎，其订数从 400 来份上升到 10 万多份。

新政权建立不久，胡乔木和胡绳写信给周恩来，建议《观察》复刊，周恩来批复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但复刊后的《观察》显然无法继承其以前的抨击时弊的风格，变成了以宣传为主的杂志，出了几期后改成了《新观察》，由戈扬任主编，父亲也退出了《新观察》。

人生

父亲一直支持我去学钢琴，也是父亲安排我去报考的音乐学院附中。

1957 年，我正在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同学看报纸时就会问我：“你父亲怎么是‘右派’？”那时中央电影制片厂拍了很多新闻片，父亲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镜头被一次次播放，然后一次次遭到批判。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人民的”敌人了。可是，在写信的时候，我还是称他“亲爱的爸爸”。班里同学在班会里就批判我说：“你的立场到哪儿去了？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

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我都被要求与父亲划

清界限，包括上世纪 80 年代我申请出国留学，文化部的领导人还问我的单位：“他和他父亲划清了界限没有？”

1958 年，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第二天，正副校长一起找我谈话，学校里有人贴大字报，说“储安平的儿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后我们还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党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迫于压力，校方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我放弃作曲，改学钢琴。

校方还建议我和父亲商量，可是不到 10 秒钟我就答应转系。父亲又能怎样呢？这对我来说，打击特别大。

我从钢琴系毕业后，留在了中央音乐学院。我有一个女朋友是钢琴系的但我们的交往因我父亲的问题而夭折。“文革”爆发一个月后，我也被揪了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定时炸弹”。

这期间中央乐团曾三次借调，想让我参与《黄河》等的创作，可“做完贡献”后，就被“样板团”“刷”回学校，由此被人戏称为“板刷”。那些改编后的作品里，也没有我的名字……

父亲诞辰 80 周年时，我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这部音乐作品已经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乐队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我在该音乐会节目单的乐曲简介中写道，这首作品“不仅刻画了晚秋的苍凉景色，而且也是对作曲家之父亲的深厚缅怀与悼念——在 1966 年一个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



正在演奏的储望华

文革首位被打死的女校长

作者 高天韵 大纪元 / 编辑 甄言

1966年8月5日15点40分，她的手表停了。不久，她的生命，也停了，就在那个下午。40年后，电影制片人胡杰扛着摄像机，来到中国社科院昌运宫宿舍社区。他走进了王晶垚的家，追寻她死亡的真相。

死亡前奏

卞仲耘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因无正校长，副校长是最高负责人)，在那里她已经工作了17年。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都是该校学生。

1966年3月，学校告诉学生，若发生地震，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卞仲耘不置可否。文革开始后，这成了卞仲耘“反对毛主席”的“罪状”。

6月22日，卞仲耘“揭发批判大会”上，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群情激愤。卞仲耘被押在台上，戴高帽、罚跪、拳打脚踢、反捆双手。红卫兵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她脊背，把污泥往她嘴里塞，往脸上抹。晕倒了，用冷水浇头，再揪着头发拖起来……

她的女学生们，花样年华，剪了辫子，穿上军装，扎起皮带，展现的却是魔鬼一般狰狞的面目。



被打死的卞仲耘和她的两个孩子

8月5日

早上，卞仲耘坐在床边，对丈夫王晶垚说，她要去学校了。夫妻对望着，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握了握手。

批斗于下午2点开始。图书资料员林莽从图书室的视窗看到，身穿草绿军装的女学生们全副武装，手持木棍或木枪，押着5位学校负责人游斗。卞仲耘走在最前面，脸上涂满墨汁。

红卫兵强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砸烂我的狗头！”声音小一点儿，红卫兵的木枪和短棍就打过来。

一个红卫兵一脚踢到她肚子上。卞仲耘伸手捂肚子，牛皮靴准确迅速地踢在了她的手背上，痛得她尖声大叫。一个大高个红卫兵便把穿着翻毛军靴的脚踩在卞仲耘身上，做出雕塑剧的姿势。打累了骂渴了的红卫兵坐在一旁吃冰棒，嘻嘻哈哈狂笑。

红卫兵们命令卞仲耘等人搬砖挑土运沙子。你搬过来，他再搬回去，劳动改造。林莽看见卞仲耘的衬衫上有血，后来才知道，红卫兵打人的棍子头上全钉着钉子。

林莽最后一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正门，卞仲耘仰面躺在正门台阶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浑身是水，抽搐不止。红卫兵命令林莽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辆平板车。抬起来时，卞仲耘鞋里的水哗哗往下流。

同时被批斗的副校长胡志涛在《八五祭》中回忆：“一辆平板车推过来……，我用双手拿下扫帚，又一层层地揭开大字报纸。‘老卞！’我几乎叫出声来。她的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已没有反应，嘴巴张着，呼噜呼噜地吐着粗气，两

只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了一条条伤痕。……她们是我倾注满腔心血培育的学生，朝夕相处，亲如家人，但现在她们却完全失去了人性，失去了理智，凶神恶煞似的向我吼叫：‘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我被她们推搡着关进了办公室。”

直到晚上7点多，卞仲耘才被送到附近的邮电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她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无言的照相机

晚上9点左右，王晶垚接到学校电话，说卞仲耘受伤了，已被送到邮电医院。在那里，一家人看到了遗体：卞仲耘头上右后方有一个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个血窟窿，遍体鳞伤，脸部、双腿、两脚浮肿。

在医院，女附中学委会红卫兵代表拒绝家属解剖尸体的要求，想要将死因归于死者生前患高血压、心脏病。最后，医院屈服于在场红卫兵的压力，在死亡证明上填写了“死因不明”。

王晶垚透露，当天晚上，邓楠、邓榕来到他家，告诉王晶垚，以后只能讲卞仲耘是因高血压病死亡，不能说卞仲耘是被打死的。

1966年8月6日，王晶垚购买了一架相机。他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妻子的尸体，全身的，半身的，头部的。他也摄下了孩子们在母亲身旁的哭泣，还有尸体火化时，焚尸炉烟囱里飘出的一缕青烟。他觉得，那是妻子的冤魂。

痛苦的回忆，全部收藏在那个旧皮箱里：一件皱巴巴的血衣，背后依稀可见用墨写的“打倒”二字。一条皱巴巴的内裤，沾着失禁的粪便。一条满是泥土和血污的裤子，一双溅着血迹的袜子，一些曾经用来擦拭伤口的纱布块。

还有一个二寸见方的小盒子，盒子里是妻子的一缕头发和一块手表，手表的指针停在3点40分，金属表带扭裂了。

《我虽死去》

1973年，卞仲耘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

仲耘家人400块钱。1978年，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但是无果。

1979年4月，王晶垚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并且控告了校外人员袁淑娥。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理由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2009年，一些原师大女附中学生为卞仲耘建造了一座铜像，原本拟定在像上题写“殁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暴力中”，后因前红卫兵们反对，最后只写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2011年，铜像揭幕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举行。

2006年，中国大陆独立电影人胡杰走访了王晶垚老先生，聚焦卞仲耘副校长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事件，制作出68分钟的纪录片《我虽死去》。胡杰说，在编辑电影的过程中，有安全部门到家里正式通知他，影片中不能收入邓楠、邓榕对王晶垚讲过的“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那段话。

文革至今仍是中共的禁忌话题，《我虽死去》也一直在大陆被禁，不过在网上传播甚广。纪录片揭示的真相震撼了观众，更引起了人们对中共邪性本质的深深思索。



2006年1月27日，85岁的王晶垚面对前妻卞仲耘的遗像黯然神伤。

消灭思想先驱的“一打三反”

佚名 大纪元 / 编辑 张华

文革中有几次运动高潮，如“红八月”杀的是“出身不好”的人，“清理阶级队伍”打击的是“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敌特分子”。而“一打三反”是要消灭有“反动思想”的人。

“一打三反”的打击对象

1971 年“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其实只有“一打”，那个“三反”只是象征性的。

“现行反革命”，就是中共认为有“反动思想”或“反动言论”的人。中共规定，对这种人，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判刑处决。就是说，规定言论可以作为判处死刑的依据，到你灵魂最深处挖掘可以判处你死刑的证据。

各地政府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公审大会，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罪名随意处决“反革命”，每次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

被镇压的所谓“反革命”，绝大多数是中共暴政的抗争者，是文革黑暗年代的殉道义士，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先驱。被镇压的所谓“反革命集团”，主要是读书会、讨论会、思想者沙龙、联谊会，这些团体谴责 1949 年以后中共的土改、镇反、肃反至文革的历次迫害运动，谴责人民公社带给农民饥荒。此外，还有大批被害者，是各地为完成中央下达的镇压指标而凑数的无辜冤魂。

周恩来亲自批准处决的遇罗克和王佩英

青年工人遇罗克，因发表《出身论》等文章，反对以出身、成分为标准迫害人而获罪。

王佩英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大饥荒灾难后，中共高层领导联手掩盖毛泽东的罪恶，掀起崇毛热潮。王佩英拒绝这样的掩盖和崇拜，在 1964 年散发标语传单，发出了在那个年代石



1967 年，遇罗克刑前的最后留影。

破天惊的呼吁，要求“让毛泽东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全国性灾难”。她被关进北京安定精神病院，在“一打三反”中被判死刑。被押赴刑场时，刽子手们为防止她呼喊，用细绳紧勒其喉，将她勒死在赴刑场的途中。

当局没有留下对遇罗克、王佩英等人的死刑判决文件、审判记录，这是周恩来遵照共产国际的作法。共产党有销毁政治犯记录的传统。

拒绝沉默的人

黄立众（又名黄美琦），原北大哲学系学生，因讲述农民生活困苦被北大开除团籍。1960 年，黄因坚持观点被开除学籍，遣送回老家安徽无为县（无为县大饥荒时饿死了 30 多万人）。目睹农村饿殍遍野的景象，他拒绝沉默，组织农民上访、外逃。外逃失败后，他秘密发起成立中国劳动党，制定了纲领，油印了《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武装抗暴，事败被捕判处死缓，在“一打三反”中被中共杀害。

1972 年 2 月，宁夏银川市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一个以 13 名青年学生

为成员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其中，中学毕业生吴述樟，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旁空白处，写下“放屁”二字。北京农业大学 1970 届毕业生鲁志立，撰写了《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一篇讨伐中共暴政的檄文：

“（中共当局）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份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

吴述樟和鲁志立被判处死刑。

此外还有厦门书写“反动标语”的侨生洪沧海，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海南白沙县某团女医生官明华，上海静安区“破坏样板戏”的谈元泉，兰州甘肃师范大学反对阶级斗争历史观的老教授张师亮，南昌反对个人迷信的青年吴晓飞……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他的喉管被割断，以免他呼喊“反动口号”。

一句老实话的代价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

“毛主席万岁”时，他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县军管会据此认定是“现行反革命”，判其死刑。于 1970 年 6 月被枪毙。

巴基斯坦外宾送给毛泽东芒果，毛转送给清华大学工宣队，工宣队又把它分送给其他单位，一时间，全国范围内掀起接送芒果、感恩戴德的旋风。送不过来，就用蜡制芒果代替。

四川雅安汉源县富林镇老牙医韩光第，看见玻璃罩里的金黄色芒果，顺口说了句：“芒果像一条红薯，没什么看头，有什么稀罕的。”公安机关以“恶毒攻击”的罪名逮捕他，一年多后竟判处死刑！韩光第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全部被赶下乡，老伴受不了这种突然的打击，也去世了，一个好端端的家被中共搞得家破人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

“一打三反”犹如严打，极其恐怖，说错话就关就杀，成了文革的杀人高潮之一。中共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将杀人权下放给基层以鼓励杀人，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了杀人场。“一打三反”之残酷，可以和文革中的另一场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比肩。

据各地官方记载，云南镇雄县“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 107 人非正常死亡”。

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 3000 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 62 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结合，共清出 5000 多“有问题的对象”，“41 人被迫自杀”。

江苏泰兴县，“1400 余名干部群众被关押、批斗，严刑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

仅复旦大学等 6 所大学就有 120 多人被逮捕、监禁，5 人被逼自杀，3 人被逼疯。

还有不少人遭到灭门处决。如南京的李立荣和他 60 岁的母亲林舜英，北京二十五中教师王守亮、杨淑辰夫妇，北京通县的侯坤、侯建民父子两人，都在“一打三反”中被处决。

丁抒博士认为，“一打三反”中至少有 200 万人受迫害；就全国而言，在这场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 10 万以上。

“破四旧”往事

作者 玉清心 林辉 刘晓 大纪元 / 编辑 张华

文革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破除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开始从北京向全国蔓延。

马连良被抄家时一段鲜为人知的细节

马连良是与梅兰芳齐名的京剧大师,为“四大须生”之首,文革中成为京剧界一号黑帮分子。马连良故居是座深宅大院,当年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一度成为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西纠”总部。马连良家很多古董古玩都被砸毁。红卫兵抄家时,发现马连良手里还攥着个翡翠鼻烟壶,栩栩如生的绘画都是从里面雕刻成的。马连良央求他们:“别毁了它,这是稀世珍宝,留着它吧,捐献给国家。”红卫兵夺过来看了看,“什么他妈的破玩意!”抡起胳膊摔在地下,翡翠鼻烟壶被摔得粉碎。

马连良当即瘫倒在地,嘴流口水,不省人事。他已是心脏病晚期,造反派却不许他去治病。连续数月的抄家和揪斗,身体和精神被极度摧残,他仰问苍天:“我至今不明白,我怎么了?”

1966年12月13日中午,马连良在“牛棚”排队买饭时,撒开手杖和饭碗,仰天一跤……三天后,一代宗师气绝身亡,时年66岁。之后他被强行火化,连土葬在回民公墓都不准。

北京人自己“破四旧”的经历

唐仕在给大纪元的投书中有段记载:乾隆皇上曾赐给她祖上一块“斗方”,是用朱砂写的一个“福”字。文革抄家时,北京人为免遭血光之灾,各家各户自己先“破四旧”,家里凡沾有“四旧”嫌疑的物件,统统处理掉,包括家谱、结婚照。“斗方”成了大家一块心病,最后由外姓的二婶动手,把这镇宅之宝化成纸浆,在后院挖个坑埋了。

父亲把爷爷穿着官袍的老照片也烧了。爷爷官服前襟有个“补子”的图案,一看就知道他是大清朝的四品官吏。

书法家沈尹默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自己的书法作品、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静时拿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文革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散存在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被销毁无计其数!

佛道圣地无数文物销毁殆尽

河南洛阳的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被称作佛教“祖庭”和“释源”。

“破四旧”之风刮到这里时,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农民,将辽代十八罗汉泥塑、2000多年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稀世珍宝玉马等佛像、经卷破坏,寺庙也差点烧掉。

1972年,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希望去白马寺参观。为了掩盖文革的罪恶,周恩来下令将北京故宫的贝叶经、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北京故宫慈宁宫、寿康宫里的佛像等运



文革中惨遭破坏的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

到白马寺,永久保存在那里。因此,现今的白马寺多是明清文物。

经过“破四旧”,国家级古迹和文物被毁坏无数。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1000尊琉璃浮雕佛像,五官无一完好。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竟有4922处在1966年的八九月间全部毁掉。

山西1600年前的天台寺,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2500年前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观被毁,道士们被遣散还俗。

就连偏远的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千佛洞的壁画,人物的眼睛都被挖空,或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广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叠彩山等处摩崖石刻佛像头部均被砸毁。贵州青龙洞内所有佛、道、儒供奉之像被砸,现仅余空房……

末代衍圣公孔德成为何拒回大陆?

历朝皇帝都推崇孔子,孔子的子孙后代也受到厚待,被敕封为“公”“侯”等。北宋仁宗时敕封的“衍圣公”持续时间最长,沿袭到生于1919年的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他在1949年离开大陆后,直至2008年终老台湾,都没再回曲阜和大陆。原因何在?

1966年文革发动后,毛泽东的干将康生把北京造反派头头谭厚兰找来,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他把图交给谭,并撂下一句话:“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率领200多人来到曲阜,高喊口号“造孔家店的反”,烧毁古书2700多册,字画900多轴,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多件,珍版书籍1700余册;砸毁历代石碑1000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更令人发指的是,还刨平孔子坟墓,挖开孔德成的父亲孔令贻与陶氏、王氏(孔德成生母)的合葬墓,曝尸数日后焚毁。

掘开孔子墓穴时,红卫兵们动用了雷管和炸药。掘出孔子骨骼示众后,将其焚毁。“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断成几截。

破坏孔子墓、孔庙、孔林,这是当年侵华



1966年,山东曲阜,红卫兵砸碎孔府匾额。

日军都没干过的恶事。

孔德成的孙女回忆说:“有天,我看到爷爷在看报,突然冒出一句:‘红卫兵连俺娘的坟都给挖了。’然后长叹一声‘唉……’。”

文革后,中共又修复孔庙、孔林、孔子墓,开始祭孔,可那多是商业化和党文化的包装,孔家的嫡系后裔孔德成拒绝承认,认为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

1990年代,曲阜当地政府代表团到台湾,拜访了孔德成先生,还向他献上包装精美的“孔府家酒”。孔德成瞥了一眼,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们孔家没有这种酒。”

让孔德成耿耿于怀的是,祖坟被挖,祖先遗骨被焚毁,可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得到中共一句真心的道歉。一向自诩“伟、光、正”的中共,怎么可能道歉呢?

结语

文革中,国宝级文物失去知多少?比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劫毁《永乐大典》要广泛、彻底得多,已无法统计。

“破四旧”表面是学生的“胡闹”,实则是中共有意操纵的暴力行为。文物、古迹是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破四旧”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在物质层面的承传破坏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其中蕴含的文化道德内涵也随即消失,传统文化被连根拔除。

留在大陆的中华民国院士之大结局

来源 大纪元 / 编辑 希金

民国 81 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院士，1949 年后到台湾的只有 9 位，去美国的有 13 位，留在大陆的有 59 人之多，占院士总数的 73%，他们的结局又怎样呢？



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

1948 年 3 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经五轮投票，选出 81 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院士。

1948 年底，国民党退守台湾前，蒋介石与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要人，紧急谋划了一个“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并拟定“抢救人员”名单，81 名院士均在名单上。蒋介石亲自下令：国宝不能留在大陆，必须带走。将他们送赴台湾。

然而，1949 年后到台湾的只有傅斯年、吴稚晖、朱家骅等 9 位，占院士总数的 11%；去了美国的有陈省身、赵元任、胡适、吴大猷等 13 人，占院士总数的 16%；

而留在大陆的有 59 人之多，占院士总数的 73%。

后来，又有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的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除了对故土的眷恋，对民生的殷殷关切和报效祖国的迫切愿望，还因为他们相信了中共的宣传，对其抱有幻想。但他们的结局大都很悲惨，下面的实例便是这个群体的缩影。

叶企荪，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民国时曾是清华大学的核心领导人之一。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陈省身等人都是他的学生。“两弹一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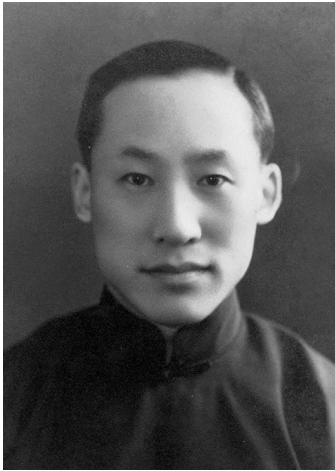
功勋中，有半数以上是他的学生，有人称他“大师的大师”。

1967 年 6 月，叶企荪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关押。叶曾一度精神失常。1968 年 4 月，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对叶发出逮捕令，连续八次对其审讯，逼迫其多次写“笔供”。1969 年 11 月，因缺乏实质证据，叶被释放回北大，但仍以“中统特务嫌疑”受隔离审查。每月只发给 50 元生活费。当时他已两脚肿胀，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身体弯成 90 度。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过他：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踉跄街头。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1977 年 1 月 13 日 21 时 30 分，叶企荪去世。终年 80 岁。

饶毓泰，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是他的学生。文革中饶毓泰遭到严酷迫害，饱受折磨，1968 年 10 月 16 日“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北京大学燕南园 51 号上吊自杀身亡，终年 78 岁。

曾昭抡，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曾国藩



叶企荪 1898-1977



曾昭抡 1899-1967



王家楫 1898-1976



汤用彤 1893-1964

胞弟曾国潢的曾孙。

1957 年被划为右派。1966 年 8 月 25 日，他的妻子俞大綱（曾国藩的曾外孙女）被强迫下跪，红卫兵剥除她的上衣，用皮带死命抽打。俞于当天服药自尽。曾昭抡承受丧妻之痛的同时，被武汉大学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他身患癌症，已经转移，但他不仅没有得到必要的治疗，仍然被隔离审查和批斗。

1967 年 12 月 8 日，曾昭抡含冤离世，终年 68 岁。

王家楫，生物学家。中国生物学的重要开拓者。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奠基人。文革中，“军工宣队”怀疑他为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骨干，将其毒打至昏厥，后监外候审。戴着“特嫌”帽子的他捱至 1976 年，终因伤病重离世，终年 79 岁。

胡先骕，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生物学开创新人之一。文革期间被抄家六七次，绝大部分生活用品、书籍、文物字画、文稿、信件、首饰等均被抄走，连过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每次抄家都被人身侮辱，逼

其写检讨、思想汇报。1968 年 7 月 15 日，在去植物所接受批斗前一天晚上，突发心肌梗塞辞世，终年 75 岁。

吴定良，人类学家、教育家，中国人类学学会的创始人。1930 年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1949 年蒋介石亲自动员他赴台，被其拒绝。

文革中，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病榻上遭批斗，工资停发，几次被抄家，多年心血积累的论文集和仅有的科研工具被洗劫一空。他在病床上痛心疾呼，嚎啕大哭，当晚病情加重。于 1969 年 3 月 24 日凌晨离世，终年 76 岁。

邓叔群，中国著名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文革中因受胞弟邓拓（“三家村反党集团”之首）株连，受尽摧残凌辱，家破人亡。于 1970 年 5 月 1 日去世，去世时遗体上还留着大面积淤血的印迹。终年 68 岁。

汤用彤，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学贯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胡适离开大陆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依然不为

所动。

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 1949 年以前取得的，之后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只偶尔写一些考证的小文章。1964 年病逝。终年 72 岁。

此外还有梁思成、陈寅恪、华罗庚、童第周、谢家成、戴芳澜、罗宗洛等长长一串名单，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道尽。

结语：痛悔佳期自误

留在中国大陆的民国院士，除郭沫若等极个别别人沦为中共的奴才之外，大都有着悲惨的遭遇，或在迫害中惨烈而死，或事后苟且偷生，郁郁而终。他们走过了清末的腐政，穿过了抗战的弹雨，历尽了民国的动荡，却没能逃过 1949 年以后的红朝厄运。

估计，他们大都有陈寅恪借《再生缘》隐晦表达的心境吧：“痛悔误上贼船，佳期自误。”如果有来生，想必一定不会作出如此错误的选择。

大师逝去，红色中国再也产生不出大师，在中华民国曾备受器重的知识精英就这样湮灭了。🇨🇳

被中共打造的“革命母亲”杨沫

作者 刘晓 大纪元 / 编辑 申辉

古人讲，男子要有担当，对妻子负责；女子要相夫教子，温良贤淑，共同达到“齐家”的和谐状态。一个温良、有爱心、懂得如何教育子女的母亲，孩子一生受益无穷。然而，中共扭曲了人性，将女人变得冷漠、强势，完全丧失了传统女性的美德。

认为孩子是累赘

据说，中共“红色经典”《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静的原型，正是作家杨沫自己。

作家老鬼（本名马波）在《我和我的母亲杨沫》一文中描述母亲“有严重的欠缺”，杨沫生前也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身为母亲的杨沫在儿子眼中的形象是这样的：周末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她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她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

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为避免敌人发现，革命的母亲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给杨沫留下深刻印象：为了革命，可以牺牲孩子。

杨沫曾生下 5 个孩子，因嫌弃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有 4 个是找别人带的。她 18 岁生的第一个孩子在其产后 12 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儿子长到 1 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喂了 8 个月母乳，就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第三个孩子青柯在 1938 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杨沫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不闻不问，青柯



1949 年刚进北京时杨沫一家的合影

8 岁时眼睛被人扎伤，杨沫才把他接到身边。

第四个孩子小胖，杨沫还想送给奶妈养。到生马波时，她又将刚出生的孩子送回老家，找人喂奶。

对于自己这种行为，杨沫说她尊崇卢梭，因为卢梭就把自己的 5 个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而共产主义的教主马克思的一些理论正是来自卢梭。

抚养孩子中冷漠的杨沫

母亲的冷漠还表现在对孩子的漠不关心。十几岁的徐然因住宿学校不习惯，一次偷偷溜了出来，走了整整一天回到家里。杨沫看到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笤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手被打破流血。

第二天，杨沫就找人将女儿送回了学校。

对于马波，从四年级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杨沫一次都没去过。孩子长大离家远行，杨沫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马波从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但马波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马波还记得，母亲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从没有给他带过点什么小纪念品。唯一例外的是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

马波小时候生病肚子疼，杨沫表现得极为冷淡，无动于衷。直到几天后，马波已奄奄一息，她才让哥哥带着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马波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

在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时，杨沫和丈夫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都放在他们的屋里，只供自己享用。他们认为自己是老干部，才可有这种待遇，孩子不配染指。他们从不

给孩子粮票。马波和哥哥一直吃不饱，哥哥曾在清华大学饿昏过。马波心痛地写道：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

文革中与孩子的矛盾加剧

文革开始后，杨沫和丈夫成了审查对象，多年受冷漠加上中共极左思想影响，让马波对他们的不满大爆发。

后来，马波在内蒙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监督改造。他曾写信向母亲求援，但常常是马波写四五封信，杨沫才回一封，还总是要他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当马波看到身边的知青，母亲千里迢迢来看望时，别提多羡慕了。后来马波与父母重逢时的平淡，连来家的客人都觉得奇怪。

姐姐小胖在唐山军垦农场被整得几乎精神失常，杨沫也置之不理，最后是徐然将其接回，才恢复了正常。

至于马波的哥哥，父母因怀疑他偷了埋在地下的 1000 块钱，而大骂他是“白眼狼”、“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之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不容孩子顶撞的杨沫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因哥哥没有去处，只得住在家中，但父母却与其一句话也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母却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也没有。

此后，哥哥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摔伤使右臂骨折，举目

无亲，给父母写信，但杨沫和丈夫依旧置之不理，直到 5 年后才恢复来往。

家里四个孩子结婚，杨沫或则反对，或则不管。

不仅对孩子，杨沫与马波的舅舅、叔叔、姑姑等亲戚的关系也都相当疏远，极少来往。冰冷，不重亲情，是杨沫在家人面前的典型形象。

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

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马波认为，与长期以来中共将人性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大加讨伐有关。冰心就因为宣扬“母爱”而受到批判。全社会提倡“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

出身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杨沫，就要表现得更为极端，认为母爱越少越好，这才算觉悟高，思想好，对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远比自己孩子关心和

热情。在单位里笑容可掬，回到家却动辄打骂孩子，冷漠粗暴，照顾粗疏。谓之曰：严格要求，不娇生惯养。

在马波看来，扭曲了母亲的人性的始作俑者，正是中共。

杨沫晚年的忏悔

晚年，杨沫与李蕴昌再婚。在特别重亲情的老伴熏陶下，杨沫也恢复了亲情。她说，这时她才感受到了天伦之乐的幸福。“哪有不疼爱儿女的母亲？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了儿女们……他们缺少母爱和母教，好可怜哇！”

晚年的杨沫加倍弥补对孩子的亏欠。她总是挂念着几个孩子，时不时地写信或通电话，问寒问暖，对孩子的困难和要求，能管就管，特别通情达理，善解人意。

此时的马波才感受到了“慈母”的滋味。只是这样回归人性的“慈母”来的太晚了。

天



晚年杨沫和儿子马波

共产主义“炼狱”中的“宗教自由”

编辑 李念



1964 年，拉萨，十世班禅喇嘛因直言批评中共治藏政策而遭受批斗侮辱。

据 2019 年媒体报道，中共官员称：“烧香拜佛就是搞封建迷信活动，就是不相信共产党。”超过 10 米的佛像要拆除，谁阻止就要抓去坐牢，谁不让拆就按扫黑除恶处理。其实，中共建政以来，“灭佛”从未间断。

1949 年后的“三教齐灭”

中共建政后，为了全面推行其“无神论”意识形态，对宗教展开大规模镇压，取缔会道门，焚毁大量经书。还要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成员到政府登记，悔过自新，违者严惩。

1950 年 9 月，中共扶植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人员算国家工作人员，按行政级别拿工资，出国由统战部出资，但得按照中共的意图解释教义。一个好友问“三自教会”的创办人、中共政协常委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这位好友被中共关进监狱 20 多年，受尽毒打欺凌。

1958 年以后，中共开展“献堂献庙”运动，美其名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上海的教堂由 208 所减少到 23 所，北京的 64 所合并为 4 所。

“三自”还开展控诉运动，长期隐藏在基督教会内的地下党员李储文积极控诉“帝国主义分子”——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毕范宇，毕被驱逐出境，而该堂的另外两位副牧师孙恩三、顾政书，一位自杀身亡，另一位死在狱中。

不愿加入“三自”教会和天主教爱国教会的宗教人士全被打成反革命。1952 年 4 月 10 日，倪柝声牧师在东北被秘密逮捕关押。1956 年被打成“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倪被判刑 15 年，关押至死。其妻因不肯与丈夫离婚而多次被鞭打受伤，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1954 年 9 月，王明道明确表示拒绝参加“三自”，被打成“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夫妻双双入狱。王入狱 22 年，其妻获刑 15 年，加 4 年刑满劳动改造。

1955 年，中共镇压不与其合作的由龚品梅主教领导的上海教区，将龚品梅主教和 30 多名神父，及教友共 183 人逮捕入狱。

据不完全统计，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杀害的，竟达 8840 人，因而遭劳改的达 39200 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 2450 人，因而遭劳改的达 24800 人。

迫害令人发指

1951 年春，受到慈禧、蒋介石尊敬的虚云法师拟在云门山大觉寺传戒，中共民兵百余人包围寺院，以该寺隐匿反革命分子、窝藏军械及金银为由，囚禁 26 名僧人，搜查全寺，逼虚云法师交出黄金白银枪械。虚云法师说没有，竟被毒打至头面血流，肋骨折断。

1951 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内决定结婚！南昌拆除三个寺庙，合建一个“南海行宫”，男女僧尼同寺修行。

佛教戒杀，中共“镇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抗美援朝”期间，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去杀人！

1955 年 7 月 1 日，中共将不与中共合作的僧尼道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枪毙。经济上的



哈尔滨极乐寺原是中国北方名寺，1966 年 8 月 24 日，红卫兵彻底捣毁了这座寺庙，还把和尚们揪到山门外当众批斗，逼迫他们手里扯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的标语自辱门楣，以示与“封建迷信”彻底决裂。

剥夺，以及政治上的“罗织罪名、万人公审、宣判、枪毙”的恐吓，使很多僧尼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中共对宗教的镇压，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无数寺庙、佛像被捣毁，无数出家人被迫还俗。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极乐寺三位僧人举著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基督教徒被强迫在信耶稣还是信毛泽东之间做抉择。广州有位牧师被红卫兵拉去公审，要他当众说“打倒上帝”，他不肯，红卫兵便将烧红的铁盒烙在他头上。

金陵协和神学院有个教职员对党表忠心，竟给耶稣罗列了 70 多条“罪状”。

被商业化和被染红的寺院

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方面从利欲上放纵打入宗教界的“党棍”，将清修的宗教场所开放变成旅游胜地，名正言顺的收香火钱、门票钱；和尚不仅可以结婚，还可以包二奶，待遇类比中共干部的行政级别，什么“局级道士”“局级方丈”“处级阿訇”“处级牧师”“科级神父”等。宗教被商业化，净土难寻。

另一方面，中共培植红色宗教信徒，用中

共思想渗透宗教。2017 年 12 月，在海南省佛教协会学习十九大精神培训班上，海南省佛教协会的负责人称“共产党就是现世的佛菩萨”，他已经手抄了 3 遍十九大报告，还准备再抄 10 遍。

陕西省汉中市一佛寺住持每月初一、十五，不再给香客讲佛学，而是宣讲中共国家政策。

2018 年 3 月，中共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共统战部，宗教进一步“中共化”。自 5 月起，当局强制大陆各地宗教活动场所，必须在显著位置悬挂五星红旗。2014 年以来，中共当局强拆了近 2000 个十字架。

2018 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部长会议谴责，中共一直对少数民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法轮功成员施行酷刑、身体虐待、任意逮捕、拘留、判刑、骚扰。

8 月 24 日，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了中共地方政府强行解散教会、关闭教堂，要求基督徒签署不信仰基督教的承诺书等荒唐事件。

万变不离其邪

1999 年，时任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叶小文表示，共产党最终要在地球上消灭所有的宗教，消灭人对神的信仰。所以，无论是取缔迫害、商业化魔变，还是红色强制渗透，万变不离其邪，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几千年来，世间正教都是教人向善、归真，中共强迫宗教“跟党走”，不仅使宗教自由坠入共产主义“炼狱”，而且使人类远离神，最终走向败坏和毁灭。



今天的和尚唱红歌

二十一
世纪
古拉格

黑监狱里的洗脑术

编辑 子规



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视频截图）

中共体制下的所谓“法制教育中心”或“法制教育学校”，实质就是“洗脑班”，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反法律的地方。它对外谎称对法轮功学员“教育转化”“春风化雨”，其实是把人折磨得生不如死的黑监狱。除了使用暴力，还有更隐蔽、更邪恶的精神虐杀术。这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也被广泛使用，但在国际社会和大陆却很少有人知道。

与世隔绝的日子

“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是北京市“610”系统办的最高级别的洗脑班，用来关押北京市公安局绑架的法轮功“重点人物”。

它是一个小的集中营式建筑，内部共有六个房间：三间约十二平方米的大监室。监室的窗户总是被厚厚的窗帘堵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点阳光。天花板上的四个灯泡 24 小时亮着，这让被关押的人不知道自己被关在什么地方，感觉不到白天黑夜、春夏秋冬的区别，从而产生恐惧、绝望的情绪。三间小禁闭室，仅有约 2 米长，1.5 米宽，前后都是密封的大铁门，也是 24 小时亮着长明灯。所有房间都装有监视器，实施 24 小时严密监控。

每个法轮功学员被单独囚禁在一个房间。北京武警部队三师配备了两个营的男武警、两个中队的女武警，24 小时轮班看押法轮功学员。

清华大学的法轮功学员王为宇博士，2002 年 8 月 12 日晚上 6 点到第二天早上天亮，在此经历了长达 10-11 个小时的电刑。

“五个身高马大的人把门踹开，冲进来把我的两个胳膊撅起来，把我的头撅到地面，用力压我的脖子。然后把我押到楼外的一个平房，后来我知道这是一个专门行刑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行刑，叫喊声等不会被别人听到。

“他们开始殴打，开始时跳起来用肘部击打我头部，很快我就晕厥了。他们又拿来一捆电棍，直接放在我脖子上，五个人按住我，用脚踩在我的头上，不停放电，直到这根电棍的电全部放完。期间警察甚至还大笑，脸都是变形的狞笑，甚至说你要是女的就好了，我们就有办法了。电棍没电了，他们还不过瘾，找来电线接在墙上的 220V 电压上，不断进行电击。

“他们怕血把我衣服弄脏，就脱掉我的上衣，用电棍的两极，因为两极很尖锐，直接插到我背上的肉里面去，然后放电。所以我整个背上全是血，同时是被电焦了的那种黑色痕迹。

“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煎熬，抑制不住的尖叫，不停的出汗，人都虚脱了，进入昏迷状态，被电击的部位在抖，但连叫喊的劲儿都没了。



王为宇博士在美国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采访视频截图）

当时我已在生命的边缘。”

在这种地方关久了，人都要发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生死边缘上煎熬，可被关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一呆就是数个月、半年。一个活着从洗脑班走出来的人说：“如果你死在那里，或者被逼疯，不会留下痕迹，也不会有人出来作证，无声无息，自生自灭。回头还会把责任推到你个人身上，说你是病死的，或自杀身亡。”

攻心术

比起上述非人的监禁生活，“洗脑”才是洗脑班的核心部份。

2001 年 8 月 5 日，李桂平是第一个被劫持到这里的。当时这个所谓的“培训中心”还未修好，武警也没有派来。李桂平的孩子刚刚出生九个月，还在哺乳期，她就被绑架来了。

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四大队大队长李继荣负责给李桂平洗脑。见她总有奶水流出，李继荣就残忍地说：“孩子想妈时，才会流奶水，你的孩子现在正在哭呢。”她还拿来李桂平未满周岁的儿子的照片，企图用“亲情”逼迫她就范。李桂平没有上当。李继荣恼羞成怒，指使打手暴打她。李桂平高喊：“法西斯！强盗！”她们说：“喊也没用，这里没人听得见！”

见李桂平总是不说话，一个原来学过按摩的帮凶就紧挨着她坐下，不断地对她点穴。她用

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对准穴位往下一按一拧，点过的部位就会无声息变青紫，又痛又麻又钻心。李桂平拒绝体罚，不蹲、不弯腰，她们就四、五个人一拥而上，把她按倒在地，对着肚子一个劲点穴，还无耻地说：“打你算舒服的。”李桂平后来回忆说：“在调遣处被电棍电时，电敏感部位，其难受程度都无法与点穴相比。”李桂平一说话，恶徒们就打她耳光；不说话就点穴。她被折磨的鼻青脸肿，一身伤。

李桂平在洗脑班经历了暴力洗脑、酷刑虐待半年之后，被非法判刑 12 年。

深谙“攻心术”的洗脑班警察，拿到了法轮功学员在高压下被迫写的“保证书”后，紧接着就逼迫其写“悔过书”、“决裂书”、“揭批书”；反复看诬蔑法轮功的录像、材料；无休止的文革式“揭批会”、写思想汇报；为“验收”其是真的转化，还强迫这些学员喝酒、骂人打人、给别人洗脑。

故意营造极端高压与“宽松”两种环境的巨大反差进行攻心。转化者可以走动、交谈、看电视、唱歌、亲人接见，甚至可以释放回家，恢复公职。

对不放弃修炼者，就进行严管，长期不许亲人接见，威胁恐吓：“不转化，就别指望回家。无限期关押，还要送劳教、劳改。”“如果你还不转化，就送你到集中营、大西北，永远也回不来的。”“你也知道，共产党有的是整人办法，什么损事都能做出来，你不要执迷不悟。”“不转化，株连三代，孩子工作都受影响。”

从杀心到杀身

洗脑班对拒不“转化”的修炼者进行严管，私设酷刑室，单独关押用刑，只要一天不转化，就不松绑。

北京海淀区八一中学美术教师秦尉，2004 年在“北京市法培中心”经历了一种闻所未闻的酷刑：每当夜晚睡着以后，就会被一种极端尖利刺耳的噪音吵醒，那是装在屋子天花板一角的一个奇怪的仪器发出的。它每隔二、三分钟或三、五分钟就尖叫一次，整夜持续不断，

声音直刺秦尉的心脏,使他心脏乱跳,手脚冰凉,难受之极。第二天,警察会特意来观察他心脏有什么异常变化,心电图、彩超等各种检测手段都用上了,每天早上一次,下午一次。

五个月中,天天如此,夜晚噪音尖叫,白天两次检查。很快,秦尉的心脏就出现了早搏、停跳、间歇、心律不齐、房颤等各种症状。事后回忆起来,秦尉觉得,这很像是为了摧毁法轮功学员的意志,在拿他的身体做试验。

第一起迫害致死案件被外媒曝光

59岁的山东省潍坊市退休工人、法轮功学员陈子秀,在“转化看管中心”里,政府官员用塑胶棍棒和电棒打她的腿、脚、后背下方,并用赶牛用的刺棒打她的头和颈部。和她同时被关押的人说,整夜都能听到从行刑室里传来她的惨叫声,那些人不停地吼叫着要她放弃法轮功,每一次,陈子秀都拒绝了。

2月20日早,奄奄一息的陈子秀被逼赤脚在雪地里爬,两天的折磨使她的双腿淤伤,她短短的黑发上粘着脓和血,她在外面爬,呕吐,倒了下去。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于2000年2月21日去世。

经过重重封锁,陈子秀被迫害致死的真相被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出来,记者伊安·约翰逊以“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为题,报道了这宗洗脑班虐杀案例。他因此获得了2001年国际最高新闻奖——“普利策”奖。

不准睡觉

只要修炼者一天不转化,就不准睡觉。

“金言鹏用牙签支着我的眼皮,我情不自禁地闭了一下眼睛,牙签折了。盛树森这时进来叫喊着:‘不能叫他睡觉,今天就是不能让他睡,不写就不许休息。’莫振山也说:‘不能让他休息。’盛、莫叫几个人打开手机放音乐。莫来到我的面前说:‘你写了三书就可以回去了。不然你是过不去的,就得判刑。’这一夜我被迫害休克了三次,但是休克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不放过



陈子秀和她的孙子孙女

我,就是连踢带打、带踹,金言鹏骑在我后背上,上下颠……”这是法轮功学员于松江自述他在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遭遇的片段。

法轮功学员经过残酷折磨后头脑迷糊了,恶人就握住法轮功学员的手写“决裂书”。

中央电视台在2002年4月8日《焦点访谈》播出了《从毁灭到新生——王博和她的爸爸妈妈》的节目,恶意将少女王博和她的父亲树立成家喻户晓的“转化典型”。

事后王博的父亲王新中撰写题为“王博的父亲王新中述《焦点访谈》造假内幕”的文章,揭露王博在劳教所是如何被转化的:“它们用24小时每天都不让睡觉的办法,连续6天不让睡觉,灌输颠倒黑白的谎言,看歪曲法轮功的录像,强制洗脑。用那里警察的话说:‘我们就是用对付间谍的办法使你精神崩溃!’”

王新中自述道:在这样的精神摧残下,“我迷迷糊糊神智不清,就这样被所谓的‘转化’了。这绝不是我的本愿。这不是我的真实思想,是对我的精神迫害。”

性迫害导致精神失常

年轻貌美的成都法轮功学员祝霞,在经过一年半多的非法劳教和整整10个月连续3个“洗



被迫害前后的祝霞

脑班”的长期关押、酷刑折磨和疯狂“洗脑”、游街示众、连续不让睡觉等折磨后,于2004年4月2日回到家中时,已经精神失常。出现幻觉幻听,不分昼夜地哭、笑、骂人、打门窗,大小便弄得到处都是,经常用手捂住头部惊恐地喊叫:“你们要强奸我吗?”据悉,祝霞在郫县洗脑班期间,在被药物迫害得精神恍惚的情况下,被两个恶徒多次强奸。

日本法轮功学员金子容子,2003年11月23日返回日本,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揭露:她被送到北京公安医院时,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在她们那里的“法制教育班”上,一个法轮功女学员被打手们脱光衣服吊在树上示众,这位女学员当时就精神失常了,被放下来后光着身子就往外跑。

林林总总的洗脑方式

综上所述,中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启用人中的败类、恶棍做打手,发明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惩罚手段,除上述手段外,还有:

药物摧残、食物投毒、不许喝水、洗澡、如厕;每人每天须在“晚讲评”时辱骂法轮功及其创始人;二三天一次,不间断地写思想认识、思

想汇报;经常性的考试、测试、个别谈话,审查“转化”是否牢固;班组株连,即一人不转化,全班停止娱乐、采买;罚坐小凳子,每天10小时以上;每天10小时以上的高强度奴工;吃饭、洗漱、上厕所强制几分钟完成;强迫参加所谓“先进班组”评选;强迫唱红歌、表演肉麻歌颂中共的文艺节目;强迫练其它气功;用被歪曲的传统文化、其他宗教教义来洗脑,等等。

“转化率”:万恶之源

在江泽民一伙控制中共核心权力时期,是以对法轮功学员转化率为政绩的首要指标的。2001年,时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提出,迫害法轮功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权制和领导责任查究制。

2003年成立的四川“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2003至2013年10年间,非法拘禁法轮功学员上千人次,迫害致死的至少有5人,在全国洗脑班中位居第一。

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有多少呢?答案只能是数不清。中央、省市县和乡镇以及各个单位、学校、工厂、军警都有自己的或联合的洗脑班,有大有小,有临时的,有长期的,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绑架进去。在明慧网上能收集到的有明确所在地信息的洗脑班,就多达3640个。

强权和暴力改变不了真正修炼者的心

古往今来的一切历史表明,所有对正信的迫害,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一样。多数在中共的高压下妥协的法轮功学员,在离开中共的黑窝后,很快清醒过来,并公开声明“重新修炼”。中共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洗脑术,在法轮大法真修者面前,都彻底失败了。

只有邪教,才会强迫人去信奉它,并用暴力迫使人放弃除它以外的一切信仰。中共正是这样一个邪教,七十年来,它对正信的迫害从未停止……

“四·二五” 万人大上访纪实

上访是为了他人了解真相

1999年4月11日，科痞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法轮功，称法轮功会像白莲教一样亡党亡国。为澄清真相，天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教育学院反映实情。4月23日，天津公安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并抓捕了45人。学员要求放人，天津公安称是执行上级命令，让学员到北京上访解决问题。

从4月24日晚开始，法轮功学员纷纷自发前往位于中南海西侧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据一位参与执勤的警察回忆，4月25日早上，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中心。起初警察在通往天安门的各个路口拦截他们，后来由警察带路，把人流导向中南海，最后形成了“所谓围攻中南海”，其实他们是来信访办的，是警察安排的“包围”。

为什么要来上访呢？参加过“四·二五”上访的清华大学高材生谢卫国博士解释说，上访是为了他人知道真相。他当时已修炼法轮功多年，法轮功如何利国利民、有利于炼功者，他有亲身体验，无论外人怎么说，都丝毫不能改变他对法轮功的坚持。

他完全可以对中共媒体上的造谣诬蔑之词置之不理，但法轮功教导他要时时处处替他人着想，要修成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好人。假如一个不了解法轮功的人，听信了媒体谎言，从而对法轮功产生仇恨心理，那他就会失去选择健康智慧善良的生活机会，无知地做出伤害自己也伤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情。

据资料记载，现场数万名法轮功学员都是抱着让世人了解真相的心愿来上访的。他们表示：我们不光是维护法轮功学员应有的公民权利，也是为了维护所有人的知情权，为了维护人



历史图片：“四·二五”万人大上访

间的正义良知。假如“真、善、忍”成了政府认定的“坏事”，那“假、恶、暴”不就会取而代之成了社会推崇提倡的标准吗？假如我们躲在家里听任诽谤中伤满天飞，最后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了，这不是助纣为虐吗？对于谎言害人，法轮功学员绝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尽量把人从谎言中救出来。

“我们向政府讲出修炼法轮功的亲身体会，这就是真；我们为了他人不受谎言欺骗，为了当局者不干错事，这就是善；为了世人能做出正确选择，我们承受无名苦难，这就是忍。425上访是符合真善忍原则的。”谢博士这样回答。

朱镕基带我们走进了中南海

目前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石采东先生，1999年“四·二五”时正在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回忆那天的经过：

“4月24日晚上，因为加班完成实验，我很晚才去学法。辅导员（编者注：义务教练动作的学员）李阿姨见我来了，边走边简单地介绍了天津发生的事。她说大家自己决定是否去上访。4月25日早晨七点半我到了府右街北口。附近街道两边和小区里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有的手里捧着书在看。人虽然很多，但

既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如往常一样赶路。公厕旁排着十多米的队伍，秩序井然。

“忽然身后人群中响起了由稀而密的掌声。我回头一看，朱镕基总理和几个工作人员正走出对面的大门，朝我们走来。

“朱镕基大概已经得知法轮功学员上访，大声问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谁叫你们来的？’‘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

“‘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来反映情况。’人群中有学员回答道。

“‘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你们有代表吗？你们谁是代表？’他问。

“‘朱总理，我可以去。’我首先自告奋勇从人群中来到他身边。‘还有谁？’朱镕基问。‘我！’‘我！’‘还有我！’……这时大家纷纷举手。学员们个个都想进去反映情况。

“‘人不能太多。’朱镕基在站出来的学员中指了指我们先站出来的三个人。我们不是推选出的代表，而是毛遂自荐的。朱镕基转身带着我们朝南海西门走去。他边走边大声问道：‘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

“‘我们没有看到呀！’我们几个都愕然地回答（事后才知道是罗干给扣押了）。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换了话题说：‘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谈。’说完他进中南海上班去了。”

在传达室石采东认识了另外两位法轮功学员，一个是北大某电脑公司的女职员，一位是下岗工人。三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讲了自己的修炼体会，四位信访办官员边听边记录。

“那位中年官员似乎觉得我们不像有备而来的代表，于是他叫我们去找负责人来。我知道法轮功是没有负责人的，大家都对照同一部法去修，当时我想去找炼功时间早的学员，也许能做补充。

“我从中南海西门出来后，问了附近几个学员，大家都互不认识，最后找了一位1994年开始炼功的学员返回西门传达室。他还没有说几句，那位四十多岁的官员打断说：‘你们反映

的情况我们将向国务院和中央领导汇报。请你们出去后，叫大家回去，尽快回家。’

“我们反映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临走的时候我概括了我们的要求，并把我们带来的几本《转法轮》送给他们，请中央领导阅读。

“当天下午，国务院领导找当时法轮大法北京研究会的学员反映的大致也是这些内容。”

警察说：这就是德！

谢卫国回忆说，那天“下午三点多，我见周围不远处有一位老太太坐在墙边，还没有吃饭喝水，我就问她：‘您需要面包和水吗？’她缓慢而客气地说：‘谢谢，我不要，我怕用后麻烦大家领我上厕所。’我唰的一下眼泪就掉下来了。这位老太太是清华一位老教师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晚上九点多，我们得知朱总理将会妥善处理这事，就收拾好周围的垃圾（包括警察扔在路上的烟头），然后各回各家。”

在场的一位女警察很受感动，她说从没见过表现这么好的上访人，几万人在那呆了十多个小时，走后地上干干净净的。“这就是德！看看人家多讲道德！”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二五”法轮功学员万人大上访。国际社会评价说是“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是“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表现。然而，三个月后的1999年7月20日，中共当局一反刚刚说过的“炼功自由”的承诺，悍然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发动了一场残酷暴力、持续20年至今仍未停止的群体灭绝性迫害。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法轮功的珍贵，他们对法轮功团体有“高山仰止”的崇敬之心。

“四·二五”为中国民众开创了反迫害维权的先河；法轮功学员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道德丰碑。他们相信：“共产专制恶贯一世，法轮大法善泽千秋！”

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作者 袁斌 凌晓辉等 大纪元 新唐人 / 编辑 陈忠

中共篡政的后三十年，尤其江泽民执政期间，以腐败作为治国方略，激起人“一切向钱看”的欲望，中共高官家族带头“闷声发大财”，结果出现制度性大规模腐败，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

中共权贵家族富可敌国

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进入 1980 年代，中共“红二代”、“官二代”被中共权贵集团选出来经营国有集团企业，这些家族很快瓜分、把持了国民经济命脉。

有美国媒体追踪，26 名中共元老后代掌管总资产 1.6 万亿美元的国营公司，这超过中国年经济产出的 1/5。

在 1990 年代，他们进军房地产以及煤炭钢铁产业。今天他们的孙子辈进入国际金融领域，成了私募投资玩家。

江泽民家族在海内外持有现金和资产合计超过 5000 亿美元，位居世界隐形首富。江的儿子江绵恒垄断了中国电信行业，孙子江志成，代表江家持有的海外资产包括基金、股票、银行、信托、能源股份、科技股份、黄金期货、房地产、海外控股公司、离岸公司等。

中共权贵家族盗取国家巨额财富占为私有，如今已富可敌国。他们转移到海外的财富已达到天文数字。

香港《争鸣》杂志 2017 年 4 月号报导，根据国务院等权威机构披露，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中国约有 15000 多亿美元资产流失在境外。这相当于 2016 年 GDP（74 万亿元）的 13%。

维基解密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 5000 个账户，2/3 是中央级官员。部级以上和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份。

目前，资金外逃已成潮流。虽然中国实施非常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但阻止不了资金外流，因为钱都控制在中共新老权贵家族手中。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并没有真正触及到这个核心。

大规模的官德沦丧

上梁不正下梁歪。绝大多数中共官员没有精神信仰，也缺乏社会理想，“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是他们唯一的信仰和动力，由此带来这些年官员群体的道德沦丧。主要表现为：

1、跑官、买官、卖官现象十分普遍。权力能带来地位、金钱等人所贪欲的一切。为此，挖空心思不择手段。

2、大笔受贿、索贿，贪污，敲诈。近几年，从贪官家中搜出的黄金动辄几十吨上百吨，搜出的现金能点坏数台验钞机。对金钱的贪婪近乎疯狂。江西婺源原县长杨峰开口就向私企老板索要上千万元。他毫无羞耻心地对客商说：“你在婺源发了财，不对我表示表示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3、贪色，淫乱。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就带头搞情妇。曾庆红、周永康、薄

熙来、徐才厚、李东生等，莫不如此。中共军队大搞黄色产业。中央电视台已经变成中共政治局的“后宫”。

中国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调查发现，中共官员腐败 60% 以上跟包“二奶”有关，被查处的贪官中 95% 有情妇。

近年来，中国社会世风日下，到处充斥着色情，淫秽不堪，这一切都与中共官员带头淫乱直接有关。

4、滥用权力，法为私器。民众因上访、批评或检举官员而获罪；敢于揭露真相的记者遭到失去公职、被失踪等报复。

《经济观察报》一名记者因报导某上市公司的负面消息，被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为名在网上通缉。内蒙古、辽宁省均发生公安跨省抓捕记者的事件。

许多官员依仗极权体制，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动用黑恶势力充当打手已屡见不鲜，甚至搞雇凶暗杀，许多地区已黑社会化。

5、谎报虚夸，欺上瞒下。为了向上爬，大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编造虚假的统计数字、说谎话已经成为了为官的基本技能和生存秘笈。

6、官商勾结、官学勾结的利益交换。浏览当今中国官员们的简历，大都拥有博士、硕士头衔，但知情人知道，这些绝大多数是假的，

是找人代写论文，或学术机构为取得可观的科研经费，主动巴结赠送学位“混”来的文凭。

总之，如今的中共已经烂到根儿了，中共官员已经烂得没有人样了，许多人人格之低下、言行之龌龊，早已突破了文明的底线。

各行各业成了疯狂的赚钱机器

中共率先放纵欲望，盗国巨贪，给全社会做了示范，人心都被带坏了，导致全国黄赌毒泛滥，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豆腐渣工程、假论文假文凭“产业链”、黑社会等等大行其道。

教师和医生这两个职业，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良心。仅以人人感同身受的看病为例：

2015 年 6 月 1 日，西安长安区农民周海元的小女儿出生 6 天了。生下宝宝后，周海元的妻子下身一直在出血，医生表示必须马上输血，医院规定需要 510 元费用，而家属身上只有 500 元，只能打电话找人送来。待家属交完钱后，院方表示，该院没有血库，必须到西安市中心血站调血。一番折腾，两个小时过去了，周妻在医院的冷漠中，终因失血过多死亡。

只因为 10 元钱，就延误救治，草菅人命！这无疑成了医德沦丧的最耻辱标本。

众所周知，“收红包”已成为医患之间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再如，大城市医院高昂的药费、体检费、住院费，已经成为供应商、医院、医生共同压在患者身上的大山，从而导致贫困人群看不起病，只能在家等死；而另一方面，有些医院和医生就靠吃回扣发财。据《新京报》报导，那些推销药品的“医药代表”，返给医生的药品回扣曾经高达 40% 左右。

有道是医者仁心，医生被誉为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可是现在的大陆，医德败坏，许多医生唯利是图，充满铜臭气息；医院沦为疯狂的赚钱机器，造成医疗品质下降、患者负担加重、医患关系紧张。

中国公民的诚信排名倒数第一

美国《科学》杂志 2019 年 6 月公布了一份



《江泽民集团瓜分中国经济内幕》（大纪元制图）



北京秀水街打出“太腐败了”的横幅

报告：研究人员在全球 40 个国家的 355 个城市进行调查，他们在官方和私人机构交付了超过 17000 个“丢失”的钱包，然后在 100 天内统计有多少人通过预留的联系方式，将钱包返还给“失主”。

结果显示，排名前五的是瑞士、挪威、荷兰、丹麦、瑞典，有 70 ~ 80% 的人联系失主，中国则在诚信排名最末。

一桩桩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触目惊心

40 年来，大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而国人的道德水准却跌落到历史最低。

2011 年 10 月 13 日，两岁幼童小悦悦正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独自玩耍，一辆面包车将她撞倒，右侧车轮从她胯部碾过。司机加大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她身上碾过。

还有呼吸的小悦悦躺在路边，一个目击者、两名路人从她身边走过，漠然不理；一辆小型货柜车开过来，再次从她身上碾过。先后共有 18 人从她身边走过，竟无人援手相救，哪怕是打个求助电话。当小悦悦被送到医院时，因抢救无效而离世。

此事引发了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潮，人们问：“如今的中国，老人跌倒不敢扶，小孩被辗没人救，中华民族怎么了？”

2010 年 11 月，有位老人卡在了护栏里，足足有 10 多分钟，众人距他只有一步之遥，竟无一人出手救命。当救护车赶到时，老人已停止了呼吸。

这类事件时常见诸于报端。中国人何以对生命如此冷漠？还有比冷漠更残忍的：2012 年 4 月 30 日清晨，在浙江，一辆桑塔纳轿车撞倒了一位 68 岁老太。车上一对 25 岁的情侣将老人扶上车并对目击者说，要送她去医院。然后，这对情侣竟驱车到远处，将老人活埋了！仅仅为了逃避酒驾处罚。

北大经济学院吴谢宇杀死亲生母亲案震惊大陆。红黄蓝虐童案，弱者屠童案，父子、夫妻、兄弟相互残杀的案件层出不穷。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已跌破到比丛林更低下的程度。中华民



2011 年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

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几千年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人伦五常，“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人的本性使然。但以上一连串事件，却不仅颠覆了中华传统美德，也颠覆了正常人性。无怪乎有人说，现在中国人所面临的，是回归人类的问题。

谁是真正的推手？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共禁止对神的信仰，奉“无神论”为国教，不断批判普世价值、“人性论”，破坏五千年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迫害信奉“真、善、忍”的好人，这一切，颠倒和毁灭了中国人的善恶价值观。文革中，中共鼓励子女与父母、夫妻、朋友、师生之间相互揭发，彻底决裂，致使亲人反目，师生成仇，朋友失信。

至今，中共媒体还常常以“革命”的名义，赞美所谓“大义灭亲”，如“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的中共鼓吹的“大英雄”王秀松，他的事迹是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如此悖逆人伦，令人不寒而栗。

有抵制暴政者，中共就残酷迫害。它就是要让人们对中共什么样的流氓恶行、荼毒虐杀，都从恐惧到习以为常，越来越麻木，有甚者还理解同情，或模仿之，正好为它所利用。

中共“把人变成非人，把一个曾经文明美好的国度，变得国已不国。”（摘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秘史”死灰复燃 难掩历史真相

作者 林辉 大纪元 / 编辑 山河

近年来，中共教育部对中小学课本大动干戈，将此前破绽百出的内容，重新编入教材。

初中《语文》教材新增版收录了如《为人民服务》、《清贫》、《朱德的扁担》、《狼牙山五壮士》等 30 多篇文章，小学教材则新增约 40 篇。当去掉遮羞布时，这些“英雄”故事无不令人汗颜。

死于烧鸦片的张思德

上个世纪 60 年代被奉为“老三篇”之一，迫令全国人民背诵的《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为延安时期的警卫战士张思德之死而写的。

“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究竟是怎么死的？根据大陆学者张耀杰的研究，张思德并非死于烧木炭，而是在制鸦片的过程中意外身亡的。

不断披露的史料揭示，中共一直宣传的在南泥湾地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其实只有少部分地种了粮食，大部分地区都种植了鸦片。张耀杰披露，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



烧制鸦片的张思德（左）（网络图片）

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有人依据张思德背木炭的照片反驳这种说法，那是因为这些人不知道鸦片是可以熬制的。谢觉哉在其日记中，曾披露了“特货”（即鸦片）的交易状况：在延安地区严禁交易，以免中共人员沾染毒瘾，而“特货”被大批卖往国统区（国民政府管辖区），因此获得了数目可观的款项。

杀亲叔和美国传教士的方志敏

《清贫》是中共地方武装领导人方志敏被捕后在狱中所作。其被捕的真实原因中共从不敢说出来。

1927 年南昌暴动失败后，方志敏等逃到边远山区继续从事颠覆活动。1933 年，他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等。1934 年 12 月，方志敏部绑架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和史文明夫妇，要求他们付出巨额赎金 2 万元，被夫妇二人拒绝。随后，达能夫妇先后被砍头。

杀死美国传教士夫妇的恶行引起了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1935 年 1 月，方志敏部在与国民党交战中战败，方志敏被俘，被民国政府以谋杀达能夫妇的罪名判处死刑，并在南昌沙窝执行。

受马列思想蛊惑的方志敏，非常残忍，在其革命早期就有所体现。2011 年 2 月 9 日，大陆《南方都市报》的《红色记忆》栏目，刊登了方志敏的孙子、彼时任南昌纪委副书记的方华清介绍方志敏的文章，内中第一部分就是《下令处死地主五叔》。文中称，方志敏加入中共后，在老家江西弋阳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

他的五叔方雨田是地主，带头反抗中共农民运动，方志敏遂带领全村贫雇农，手拿铁叉、锄头，包围了他的大院，将其抓住。当时，方志敏的祖母和父亲都为其五叔求情，但他还是坚决下令处死了方雨生。

方雨生到底有多大的罪过，是否应被处死，文章并没有细说，然而从近年来对于被镇压“地主”的纪实材料看，“地主”私产绝大多数是省吃俭用积累来的财富，并非强抢强夺，因此才有方志敏的祖母和父亲为其求情。方志敏为了所谓的革命，为了所谓的党派利益，竟然不惜杀掉自己的亲叔叔，中共却赞其为是“大义灭亲”，可见正是方志敏所信奉的马列主义让他不知人伦天理。

《吃水不忘挖井人》遭质疑

1952 年出现在小学课文上的《吃水不忘挖井人》，说的是江西瑞金城外的沙洲坝村，曾是彼时中共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因为没有水井，所以毛泽东就带人挖了一口，当地人由此时刻不忘毛。当地也成为了红色景点。

不过，这篇课文近年来却遭到了质疑。那么多首脑机关，小村子沙洲坝还有百姓居住吗？除了地主房产可强占，腾房的普通百姓如何安置？要知道，当时中共的机关单位还有不少人，而且还有警卫团、军队等。这口水井到底是给谁挖的？

2015 年媒体曾多方探寻作者，却发现是集体创作，是执行上级的宣传命令，并无具体的执笔者对此负责。

《朱德的扁担》涉嫌造假

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一篇颂扬中共前军事领导人朱德艰苦朴素精神的文章——《朱德的扁担》被编入了小学教材中。然而，这篇文章却因为涉嫌造假而在 2010 年被从课本中剔除。

文章大意是说：1928 年，朱德与毛泽东在（暴动失败逃到）井冈山会师后，因东西不够吃，只好派人去往返有五六十里的茅坪去挑粮。当时走的都是山路，因此非常难走。可肚子要紧，



所以，身为军长的朱德也跟战士们一块儿挑粮。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并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大家就不好意思再藏起他的扁担了。

小学课本中的《朱德的扁担》中扁担上的刻字是：“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然而 1949 年之前并没有简化字，按照当时的正体字，应当是“朱德扁擔，不准亂拿”，看来制造扁担的人忘记了这一点。在质疑声中，该课文从课本中被剔除。

同上述造假之处相比，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主人公的两番被更改。1966 年文革爆发后，朱德也被打倒，称其为“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内容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北京街头，还贴到了中南海。而此时，紧随毛的林彪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于是，在 1967 年 2 月，同样一篇课文悄然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更改后的文章称当年是林彪而非朱德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带着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会师的。几年后林彪事件发生后，主人公则再次被悄悄换回。扁担的主人公，也可以随着时势变化，中共的笔杆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见一斑。

结语

中共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愚民七十载，中华文化中礼义廉耻，一扫而光，却要靠谎言与宣传灌输给小学生。假的就是假的，当真相走入千家万户之时，也是中共谎言烟消云散之际。天



回答钱学森之问

作者 爱德华 大纪元 / 编辑 陈浩

现在的中国教育为何不能培养出一流人才？钱学森临死前提出这个世纪之问。其实，只要对比中共国与中国古代、西方的教育，就不难得出答案。

有无精神信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瑞特·乍克曼博士在其 1977 年出版的著作《科技英才——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统计，从 1901 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 286 位科学家中，73% 的获奖者是基督徒，19% 是犹太教徒。

2002 年 2 月 23 日，美国总统布什到清华大学演讲，他说，美国有 95% 的人都有宗教信仰。

而今日大陆的教师没有精神信仰，师德败坏，根本谈不上传统的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师者形象。中小学教师为了创收，打着各种名目的“补习”乱收费；大学教授有性侵异性学生的，有文凭学历造假的，有剽窃论文的，有不务正业到处捞钱的，难怪人们戏称他们为“叫兽”。

文革中，中共把正信、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等一概视为“四旧”与封建迷信，并加以彻底毁灭，然后用以“假、恶、斗”为核心的无神论党文化充当信仰，强制灌输给教师和学生，遗祸至今。

政治、政府是否干涉学校事务

西方乃至民国时期，校长和各学院院长由教授自己选拔；教师想做什么课题研究，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大学是真正的“教授学生联合”。政府不能决定或者影响大学内部的任何事情。

党派在大学没有任何常设组织，不能进入大学进行宣传。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要求。

而中共窃取政权后，在学校层层设立党团组织，学生尚未步入社会即被诱导加入党团组织。

有无洗脑灌输

中国传统教育理念是传道授业解惑。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启发学生的想像力，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提

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中共的课堂都成了政治宣传阵地，从中小学到大学、研究生，无论何种学科专业，必须开设政治课，灌输所谓讲政治的“革命教育”，宣传仇恨的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理论，蛊惑学生要爱领袖、爱党，永远跟党走。

中共任意篡改历史，掩盖历史真相，颠倒黑白，以史为鉴的历史教育方法成为奢谈。学生成天学的背的都是谎言，教师自己都不信也得教，学生们特反感还得学。

中共将上述谎言和党文化强行植入标准答案中，利用考试手段给学生反复洗脑，长此以往，学生就成了没有正邪、是非、善恶观念的人，也没有了道义的担当。

中共的教育是强制性的应试教育，高强度的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得到的不是求知的快乐，而是厌学。学生获得的是通过考试的技能，而失去了运用知识的技能，扼杀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想像力、创造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今的大陆学生为何告密者盛行？

这样的教育怎么能培养出一流人才呢？只能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即：不能辨明善恶，不管公平正义，不承担道义责任，一味以自我为中心，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利益，只按党的要求去做，“忠诚”地配合中共体制，善于表演，成为权力的附庸。这种人最便于中共控制。在威逼利诱下，根本无所谓学术观点和思想，纯粹为了自己未来的“前途”，可以恩将仇报，可以出卖师长，可以泯灭良知。只有在极权统治的社会，才会盛产这种卑贱的灵魂。

中共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毁灭人的思想。



神韻晚會 2020 SHEN YUN



ENTIRELY NEW 2020 PRODUCTION
ACCOMPANIED BY LIVE ORCHESTRA

神韻 复兴中华传统 引领普世价值

文章来源 正见网 / 编辑 山河

神韵艺术团，是当今世界上最顶尖的中国古典舞表演团队。自 2018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9 年 5 月 12 日，神韵六大艺术团同步全球巡回演出，共计在 150 个城市上演了近 670 场演出，覆盖百万名观众，创下历年巡回演出最大规模的纪录。神韵莅临，盛况频现：演出爆满加座、一票难求，一些观众甚至搭乘飞机赶赴追看。

神韵艺术团的宗旨是复兴五千年中国文化。曾经，“神州”大地，敬天信神，重德行善。然而，自 1949 年共产党掌权后，华夏大地经历了一场文化浩劫，五千年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被毁坏殆尽。今天，通过动人心魄的舞蹈与音乐，神韵令中华神传文化再现辉煌。

神韵是修炼人的艺术团体，自律性强，其成员都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修炼人，在提高艺术技巧的同时，提升道德标准和精神境界。神韵吸纳了世界各地的顶级艺术家，出于对传统艺术的热爱，为着同一个愿望：复兴真正的中华神传文化并向全世界传播！

罗宇：神韵唤起思考，犹如神在关照

罗瑞卿次子，今年 71 岁的罗宇，曾任职中共总参谋部，大校军衔，后因反对中共六四屠杀而离开大陆，到香港定居，后旅居美国。

在看过神韵巡回艺术团在费城音乐学院剧院的演出之后，罗宇由衷赞叹说：“这不可思议啊！”他一连说了好几遍。

在脱离中共后，他对于父辈创建的中共一党专政体制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进行了反思。看到神韵在舞台上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唤起了他曾经在精神层面上有过的许多思考。

“中国的传统文化从道德层面，从信仰层面来讲都是很高的。中国现在就是丢失了传统文化，没有道德，也没有修养，所以国内现在才危机重重，危机遍地。”

神韵通过中国古典舞，展现了中华传统的神传文化。罗宇深有感触，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一段从无神论到信神的回归。他从小在国内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从六四开始以后，我就逐渐变成了有神论。在人之外有一个高于人的，你说是神吧，或者你说是别的，你给他起个别的名字也好。他在注视着你，在关照着您。我自己就觉得，神在关照着您。”





前中情局高官：要了解中国文化，最好是看神韵

Michael Sulick 先生是一位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在 CIA 工作三十多年。他于 2007 年至 2010 年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秘密行动处处长。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首府罗利市看了神韵演出，他说：“我认为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来自于媒体，而且新闻中很多都是关于中共和现今的中国，但是那些显然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全部。我认为，最好是看这里（神韵）所展现的（中华文化），未含共产党的宣传。”

Sulick 先生说到：“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让人有兴趣去看神韵演出。我认为，神韵在很短的两个小时之中，很好地展现了这个悠久历史。”

底特律歌剧院创始人：神韵正改变世界

底特律歌剧院创始人兼院长 David Di Chiera 先生曾是 Dayton 歌剧院的总监，并创办了加州奥兰治县太平洋歌剧院，是全国唯一一个独立协作创立并领导两个歌剧院的总监。2010 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授予他最高终身成就歌剧荣誉奖。

David Di Chiera 在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底特律歌剧院的演出后，用略显激动的心情，表达出他对神韵艺术家们的敬意。对于神韵演出展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跨越，他赞叹地说：“任何像神韵这样的演出，一定对世界是有影响的，这种改变是不能量化的，但是你知道她（神韵）在改变着世界。”

意大利公主：获得了心灵的净化与提升

意大利前王室公主维多利亚·科隆纳·迪·斯蒂利亚诺 Vittoria Colonna di Stigliano)，观看了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佛罗伦萨威尔第剧院的演出。这位学习过绘画、歌剧表演，集作家、导演和制片人于一身，多才多艺的公主走出剧院时有许多感受。

她激动地说：“神韵演出是精彩绝伦的艺术盛典，不仅给观众们带来无与伦比的视听享受，也带来心灵的触动与震撼，很多观众表示不仅从演出中学习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也获得心灵上的净化与提升。”

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者：不要错过神韵

有着一百年历史的非营利组织底特律大都会

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ropolitan Detroit (IIMD)），其全球教育总监纳达·戴格姆妮（Nada Dalgamouni）女士，因致力于发展教育计划而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她观看了 2019 年 3 月 1 日底特律的首场神韵演出，她说：“我是这里的常客，我的组织一直也在推广神韵演出，组织里有上万的人在关注网络。”

“神韵绝对美丽、绝对美丽。”她说，“我在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发神韵的推文，告诉人们：不要错过神韵，当神韵来底特律时，你必须去观看，太美丽了！”

大陆观众感受神韵之美

2019 年 3 月 17 日至 3 月 31 日，神韵世界艺术团在韩国五个城市的 11 场巡回演出，反馈热烈。不仅吸引了当地主流民众，不少大陆民众也慕名专程飞抵韩国观看。

大陆国企老板高明（化名）六次追看神韵，他说：“每一次的内容都有变化，看了六次神韵了，还是觉得很好看，有内心获得提升的一种满足感。”

自大陆赴韩经商多年的张吉（化名）说：“看完神韵，感觉心灵受到洗礼，中国大陆的每个人都应该看一次神韵，了解真正的艺术，真正的文化。”他赞叹道：“看完以后心灵受到震撼，获得感动。这样的节目能够帮助人们找回传统，这是治疗中国

社会问题最有效的办法。”

从事科研工作的黄善（化名）专程请假飞抵韩国看神韵，他表示，神韵演出传递的“仁、义、礼、智、信”、“敬天重德”的价值观让他很感动，很发人深省；在海外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所做的努力让他感到敬佩，更以身为中国人而荣。“冥冥之中肯定有神的存在，我时刻会约束自己的言行，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绝对相信因果报应。”他并期盼，“希望神韵能早日到中国演出。”

大陆华人：震撼到心灵深处，望神韵早日来中国

久闻神韵盛名，大陆粉丝陈先生（化名）带着女儿一起来到韩国观赏神韵演出，一连看了两场。当大幕一拉开，陈先生感到相当震撼，一再强调能量特别强：“对整个身体的冲击就是特别强的能量，看了那个节目我就想流泪。”

他说：“我感觉正一定能胜邪，真、善、忍一定能回归到人间，一定能够战胜邪恶，相信这一天很快就能到来。”

“我连续看了两场，真的很震撼，能够震撼到心灵深处。能来看神韵演出，真的不枉此行，不枉此行。”他更说出了心中的企盼：“神韵要是进入大陆，肯定是场场爆满，在全国各地一定很爆满的。因为她是弘扬美的、善的东西。”



突破网络封锁 寻找真实世界

翻墙软件获取方法

电脑版 <https://git.io/fgp> <https://git.io/umexe>

安卓版 <https://git.io/fgma>

<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温馨提示

用国产浏览器可能打不开这些网址，建议使用IE、Edge、Chrome 或火狐等浏览器。

了解更多真相，请访问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五千法轮功学员排字 民众赞叹景象完美

2019年5月18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市总督岛举行排字活动，排出巨型法轮图形和“真善忍”三个大字，场景壮观。民众赞叹：“蓝天白云，黄衫绿草，背景是纽约的高楼大厦，互相映衬，美得绝无仅有！”